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艾青传——诗坛圣火



题艾青雕像

——代序

(一)

我要把空气
当作汉白玉，
借来艺术家的刀子
雕刻我的诗句。
书桌上的稿纸太薄，
怎能经受斧凿？
手中之笔太钝，
怎能用它磨砺？
面对着这尊雕像，
我对雕刻家充满了妒忌——
你给石膏、泥土以生命，
手下的形象充满了立体的魅力！
头部层次分明，
额角的两边一高一低，
天庭异常开阔，
像一片精耕细作的土地。
他用微笑的目光，
去捕捉诗意，
看不见身边琐事，
专心寻找形象和比喻……

(二)

向后梳理的头发，
是一团海浪涌起，
生命就像珠贝，
起伏在波涛里。
他爱面向海洋，
与大海一起呼吸！
我想起南海之滨的春天，
他曾在天涯海角寻觅——
那失落的青春岁月，
那潜伏的诗情画意。
他说：浪头打了我一巴掌，
海说：这是我们的敬礼……
一颗跳跃的心，
沉浮在大海里，
在带着苦味的海水中，
他裸露着自己。
雕塑家，你也去南海了吗？
你可看见他面向海洋时？……

(三)

微笑着，用他的眼神，
眼睛总是湿漉漉的，
望着这黑色的土地——
那是诞生了甜果与苦果的母亲啊，
他是你的儿子。
他在这条路上走过，
举过火把，吹过芦笛。
看着雪花在地上飘落，
看着车轮的痕迹……
他笑了，笑也带些神秘，
他知道这条路的崎岖。
命运驱赶着他走啊，走啊，
希望他有一天倒地！
可是，他没有倒下，
他用点燃的烟头照亮自己，
烟在他的手里，
火在他的心里。
他笑了，为他钟爱着的土地，
土地上的每一根青草，
草丛中的每一条小溪，
以及每一个黎明带来的晨曦……
他总是在黎明之前起床，
写露珠一样清新的诗，
他的笔尖像长河，
一直伸到朝霞里……

(四)

雕像静静地立在他的案头，
望着雕像就是望着自己。
望着他曾走过的那段历史。
那是整整七十一岁，
书桌上站起了岁月的影子。
雕像在对他微笑，
他在雕像前沉思。
是一尊小小的头像，
原料是石膏和黄泥。
是大地的一角，是田野的气息，
混合着水与草的芳香，
显示着山与海的气势。
高矮难分，大小由之，
雕像的基石是他的诗。
他的诗将要载着他的像，
走到人们心里！

(五)

—这是一尊像，
这是一首诗。
昂起的头颅就是诗，
微笑的眼神就是诗。
艾青的诗
溶化到了雕刻家的心里。
活生生的雕像，
几乎要发出言语。
它望着案头的稿纸，
它望着烟灰缸里的烟蒂，
假若夜风把稿笺吹乱，
它会把书桌重新整理！
这是一尊像，
这是一首诗……
1981年4月6日深夜——7日凌晨
于北京天桥斗室

艾青传——诗坛圣火

第一章 桂林，月下，纯金的三轮马车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张得蒂，亲爱的雕塑家，你知道艾青是多么喜欢这个塑像吗？

在艾青寓居的北纬饭店的套间里，这座雕像就放在艾青的书桌上。

他时常笑咪咪地望着，而雕像的多少带点优郁的眼神，也一直在望着他。

是在探测心灵的秘密吗？

是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着发现自己——尤其是走过了艰难的长途、饱尝了人生的甘苦的人。然而，面对着镜子里的自身，却是远远不够的——那是一个平面，也是一种实录，无异于照像的。

艾青跟朋友们说过：“这个雕像是像我的。”

面对着这座雕像，作为一个长者、一个前辈、一个蜚声文坛的大诗人的艾青、变得具体了，可以让人从容地看得更加真切了。他的一些特点活现在人们的服前：那忧郁的、含着泪水的笑，是在暗夜里盼着曙色的笑，是经过苦寒以后看见春天的笑。他的额头是一高一低的，这使人想到他出世时的不容易，是罕见的难产，他好象并不愿意来到人间，而人间也并不欢迎他。他的天庭是异常开阔的，那里仿佛是一片辽远的、精耕细作的土地……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诗人的浩光，而更像是一个农民。淳朴、厚道、只知道辛勤劳作，决不会工于心计。

他的皱纹深广而弯曲，就像是他曾走过的道路，也是他的笔耕的缩影。他以含蓄的诗袒露着自己的情怀。

他从不会装假，但，也决不能因此断定他的心的一角就没有藏着秘密。

珍藏着的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回忆，是为了有一天化作轻烟时，仍然属于自己。

要知道他的秘密，还得从他的眼神里去寻找。

回忆中的雕像，是自由自在的。

埋藏得最深的那个年代。

桂林、月下，纯金的三轮马车。

一个美貌端庄、多才多情、正直善良的姑娘。

一部论诗的美文——《诗论》的诞生……

1939年的一个夜晚，日本鬼子的飞机刚刚轰炸不久，地上坑坑洼洼的。多雨的桂林，在一场暴雨之后，显得恬静而清新。艾青和“救亡日报”的女记者高浩结伴，去看望日本友人鹿地亘。离开鹿地亘的寓所时，已是深夜了。在“再见”声中，鹿地亘把住所的铁门“咣当”一声锁上了。崖外，在一片旷野中，在那一条小路上，只有艾青和高浩。

天上的月亮从一朵白云钻进了一朵黑云中。地上是一个挨一个的水坑。

从月光下看去，并肩而行的高浩的脸都是一个剪影——一个模糊的教人捉摸不透的剪影——一个美丽得使人不知道怎么描述才好的剪影……

世界是沉寂的——尽管，明晨，战争就有可能向这儿逼近——但，此刻的确是宁静的——连隐隐绰绰的树木，都像梦境一样。

这种宁静，是可以教想爱的心灵融化的。

艾青挽住了高浩的胳膊。

他们离得更近了。

他们走着，不知道脚下有没有路，也不知要究竟走向哪里。

他们只是感到：在这个时候，甚至连说话也是多余的，只要走着、在一起走着就够了。

他们的目光在对视的一刹那，使这个寂静的、多云的夜晚忽然生出了很多光亮。

艾青说：“我想吻你。”

高浩说：“不，有人会看见的。”

艾青茫然地环视四周，哪儿有人呢？

这是有礼貌的拒绝，但，它却使艾青更加深了对高浩的爱慕。

美丽而又不轻浮、不浅薄，这才是真正的美呀！

时值 22 岁的高浩，是中等偏高的身材，苗条的身段会使来自北方的人想起小白桦树，也像是南国竹林里一枝嫩绿欲滴的新竹。她的温文尔雅是大家闺秀的风度，但她也不拘谨，更没有故作姿态的搔首弄姿；她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是长得很美的，这也正如她虽然颇有学问，却从不卖弄，与人谈话时常常用新月似的眸子看着对方，不时地以她惯用的口头语“哦？”“喔！”表示设问和惊讶的谦虚好学一样。

她的聪敏，她的女性的细腻，她的多情而又被封建礼教所束缚，是矛盾着交织在心灵里的。

在一次文化人的集会上，高浩朗诵了艾青的一首诗，效果自傲是极好的，艾青惊讶了：这个女孩子是怎样透彻地理解着自己的诗的啊！但，在后来见报的一则消息中却是这样写的：艾青先生的诗是真正美的，高浩女士的朗诵是无法表达的，云云。后来艾青才知道，化名写这一则消息的，正是高浩自己。

艾青与高浩一起看电影的时候，高浩是这样不动声色而又十分巧妙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和芳龄的：“我爸爸像夏伯阳，有一部大胡子；他死的时候，我和妹妹都还小；我比妹妹大三岁，我妹妹十九岁了。”……

艾青听着，想着，心里有了微微的醉意。

他是真的倾倒于高浩的品质、风度及容貌了。

他决心向高浩进攻。

他自己在事隔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说：“我在恋爱上性急得很！”

更何况，其时，艾青与自己的夫人张竹茹的感情已濒于崩溃的边缘。

他和张竹茹的结合，用艾青自己的话说，本来就是没有萌芽的爱情——是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艾青一想起张竹茹曾大段大段地从张资平的言情小说里照抄不误，再改头换面成自己的文字，作为情书写给他时，心里就有一种厌恶之感：原来谈情说爱也可以弄虚作假的。

拜访鹿地亘的第二天，艾青就给远在浙江老家的张竹茹写了一封要求离婚的信，并且告诉了高浩，高浩着急他说：“这怎么也许，连高浩自己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乱岁月里，青春的花朵是一样开放的，爱情的机遇是一样存在的，而命运对于多情、善良的人的捉弄，却往往是更加无情的。

高浩犹豫着。

她的多病的母亲需要她料理，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妹妹需要照顾，她已经

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者了，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但，对于恋爱却是陌生的——尽管，她知道自己在心里爱着艾青——一个有妇之夫——而且，像这样的终身大事，又怎么向母亲启口，又怎么能背着久在病中的母亲呢？

艾青是不顾一切的。

他以为，只要是真诚的爱，就应该去大胆的追求。

他们时常约会。

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纵谈时势、文学的时候，心灵总是相通的。

思想会变得活跃。

心情会变得开朗。

笼罩着他们的，是一片美的氛围。

艾青把高浩请到住所时，总是摆好了谈恋爱的架势：茶几上有糖、也有苹果。

谈着，谈着，艾青的目光集中到了高浩的那一只白嫩的小手上。

这一只手刚好放在茶几的另一边。

艾青伸出手去，想握住高浩的手。高浩悄悄顶又迅速地把手缩了回去。

艾青只好悄悄地收拢了自己的手。

高浩却又把手伸了出来。

艾青再想去握的时候，高浩照例又退缩了……

艾青是性急的，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1939年。夏天。

他们两个因为高浩的提议结伴去桂林郊区看一个农场。一路上边走边谈，真希望脚下的路越长越好。

临近农场时，要过一条小溪，小溪里浅浅的水在潺潺一流，琴键似的鹅卵石错落不齐地排列着，多美的山野啊！高浩站在小溪中间，象孩子似地笑着。那一天，她穿的是剪裁得体的阴蓝布旗袍，浑身上下的线条是那样地清晰。怔怔地望着的艾青，如醉如痴了。

就连这样的幽会，高浩也总是若即若离的：她细心地保护着那一根脆弱的爱情的红丝线；但，她又顾虑重重，在迷惘中徘徊着。

有时，她好像是有意避而不谈。

在她给艾青的一封信中，她写道：“你是个大诗人，应该为祖国和人类多做贡献！”

倘若不是理解了艾青，她会这样写吗？

倘若不是期望着艾青，她会这样写吗？

倘若不是深爱着艾青，她会这样写吗？

艾青是记住了、实践着高浩的信中的祝愿的——虽然，他们之间的短暂的、纯洁的爱情，最后是以悲剧告终的。

艾青自有艾青的执着的所爱，但，他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也不是西子湖边背着画夹的迷惘的少年了。

他也不是巴黎街头踽踽独行的流浪者了。

他已经置身于革命者的队伍，做着革命者的事业了。

当然，他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走到这一支队伍中去的。他在桂林一年的时间里写成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等脍炙人口的诗。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和诗歌理论中作为奇峰突起的《诗论》、《诗人

论》，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完稿的。

为中国的诗歌爱好者爱不释手的这些名篇，至今非但魅力不减，相反更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艾青的洋溢的才华、超群的智慧。

关于这些著作，艾青对笔者说过，“就在和高浩接触的过程中，我写完了《诗论》，《诗人论》。

也许是他们曾经常谈的话题。

也许是一个纯洁的女性的温柔的纤手，与艾青的手一起，驱使着同一枝笔的缘故。

也许是一种美的形象，引起了诗人的无数的灵感与想象。

好像是地下的甘泉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好像是沉闷太久的空气，因为一声雷鸣而触发的倾盆大雨。

好像是干枯的笔忽然伸进了一处源头……

在那样动乱的年月里，在不时要准备躲避空袭的警报声中，在书桌和稿纸都得不到安静的早晨和夜晚，艾青除了以诗的呐喊直接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外，还写下了为着久远的岁月中、为着新诗的千秋万代所需要的《诗论》。

在这些文字中是嗅不到火药味的。

在这些文字中是找不见标语口号的。

在这些文字中，所涵盖的是：哲学、美学、伦理；是真、善美的探究；是人生的真谛。它以更加辽阔的广度，更加深刻的深度，表现着艾青的知识、学问、性格与为人。

它是越过了那个年代的时间与空间的。但，它是从那个年代出发的，一样是战士与诗人的宣言和倾诉。

……

……为着笔者几乎无法表述的原因，这里摘录一些片断——

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

真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它给予我们时于未来的信赖。

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

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

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

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

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的。这种闪的犹如飞溅在黑暗里的一些火花，也犹如用凿与斧打击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

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

如正义的指挥刀之能组织人民的步伐，诗人的笔必须为人民精神的坚固与一致而努力。

诗是自由的使者，永远忠实地给人类以慰勉，在人类的心里，播撒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坚信的种子。

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

智慧的含苞，常常为斗争而准备开放。

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

诗比其它文学样式都更需要明朗性，简洁性，形象性。

在一定的规律里自由或者奔放。

艺术的规律是在变化里取得统一、是在参错里取得和谐，是在运动里取得均衡，是在繁杂里取得单纯、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

才智是控制题材的力量的富足，是表现技巧的困难的减除；是对于今日世界的批判的严正与锐利，是对于明日世界的瞩望的勇敢与明澈。

朴素是对于词藻的奢侈的摒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约束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宽阔的笑。

不能把混沌与朦胧指为含蓄；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藏，是子弹在枪膛里的沉默。

苦难比幸福更美。

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

悲剧是善与恶相斗争时，善的一面失败时才产生的。

悲剧使人生充满了严肃。

悲剧使人的情感圣洁化。

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对于自然的歌唱，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自然取得财富的缘故。——这有如我们永远爱着哺育我们的母亲一样。

对主题没有爱情，不会产生健康的完美的作品。

人类的歌，这是最丰富的歌，最多变化的歌，最魅惑我们的歌，最能支配我们的歌……人类是歌者之王。

仅仅是上述所引的片断，就足以看出：艾青是如何大胆地、博学地、深广地以自己敞开的心灵，借助着诗的语言，把自己的世界观、美学观、把自己将要毕生追求的艺术的至高天上的境界，昭示在读者与社会面前的。

其时，艾青年方 29 岁。

作为诗人的艾青，自从《大堰河——我的保姆》使他一举成名以后，已经蜚声文坛，艾青的名字，尤其在向往革命、进步与民主的文学青年中，是与朝霞，花露一般清新而迷人的。

鹿地亘就曾当着艾青与高浩的面感叹过：“日本没有鲁迅的小说，也没有艾青的诗”。

那么，作为诗论家的艾青呢？

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有趣的现象，艾青当时的理论——即诗的美学的思考与著述，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同期或早期的诗作水平——尽管，毫无疑问，作为青年诗人的艾青，在 30 年代至 40 年代，他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他的《诗论》所挖掘的，是深埋着的、千年万年的文学艺术的矿藏。

他的《诗论》所揭示的，是从脚下开始，直到遥远的追求者的境界。

他的后来的创作日见精粹、佳作不断问世，他的诗的声音在人为的“地震”企图将其毁灭时而依旧巍然屹立的秘密之所在就是：他的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他有明确的理论的指导。

他以他的真诚赢得了读者，也赢得了光彩。

他以他的执着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历史。

艾青的《诗论》脱稿了——自 1938 年起，在桂林，他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时间，那动乱的岁月，无法扼制这一朵奇花珍卉的出土。而第一个读这些《诗论》，认识这些《诗论》，并以由衷的微笑表示赞赏，希望艾青写下去的人，便是高浩。至于说，在这些诗论中，有没有一处两处高浩的影子—

——那一种美的倩影，在诗人的心灵里是不能轻易消失的，也是很容易流露在笔端的。这一切，就要由细心的读者自己去体察了。

但，艾青与高浩的恋爱，却像是一株小树，在尚未开花时便折断了。

就在这个时候，艾青与后来成为他第二个夫人的韦茨相识，并很快就同居了。

有一天，高浩兴冲冲地去看艾青，看见了屋里的韦茨，随即飘然离去。

她的神态，她的眉宇间的细微的变化，还有她的明净的眸子里有没有闪动着泪花，那是谁也不知道的。或许，高浩本来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什么，哪有比默默的痛苦、默默的爱更为珍贵，更为纯洁的呢？

伟大的女性啊！

高浩从没有拘怨过艾青——也许，她是有理由抱怨的。她只是跟一个朋友发过这样的感慨：“你知道受屠格涅夫的那个夫人吗？她一直是屠格涅夫的第三个读者，我再也没有她的幸福了。”

后来，高浩也成了家，并且一直忠实于自己的丈夫。

她不幸得了精神病，久治不愈，在痛苦中去世于十年动乱中。

凋谢的，是一朵美丽的花儿。

永生的，是一个纯净的灵魂。

不用发更多的感慨了。

历史如长江大何，人生如浪花帆影。

有失之交臂，而留下填补不尽的遗憾的；也有机遇的巧合，最终还是分道扬镳的。

谁能分出是是非非？

还是不了了之的好！

在桂林，一个偶然的会，艾青与高浩在宴会上又见面了，并且是邻座。

什么样的宴席都会散去的。

艾青看看自己的杯里还有剩下的一点紫红色的葡萄酒，对高浩说：“让我们把最后一点酒喝完吧！”

高浩落落大方地应声而起：“干杯！”

这轻轻的“当”的一声，多像是休止符号——在一章没有完成的曲谱里——也像是纯金的三轮马车离开一个驿站时留下的惜别之声……进入了古稀之年的艾青，在回忆中，高浩的形象是十分清晰的。

艾青说：“她的额头没有一点儿皱纹，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斑点。”

第二章 巴黎的玫瑰与醉汉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就像艾青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样，这雕像的回忆也是绵绵无尽的。

这座雕像只是艾青的头像。

至于艾青曾经走过的流浪者的道路，跋涉者的道路，革命者的道路，却是看不见任何印记的。——是雕塑家有意留给后人去考证、去摸索、去想象的吗？

艾青从落地起，就是命运多舛，举步维艰的。

他的第一个脚印就是艰难的。

他用自己的求索的脚印探求着路，探求着人生和艺术的路，探求着他爱得太深的土地上不再有饥饿、寒冷，不再有永不收回去的乞丐的手的路。

他是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

他在叛逆中铸造自己的性格。

他由同情、怜悯旧中国底层的穷苦人民，进而为他们奔走，呼号，以自己的深沉的、忧郁的、激愤的诗歌，吹响了战斗者的号角。

他是在流浪中投身革命的，

他是在流浪中成为诗人的。

他的早年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并不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只是为了画画，为了年轻人的对于远方的浪漫的向往——自然，其中也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对黑暗的反抗。

巴黎的三年，是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在父亲断绝经济接济后，艾青只好半工半读。他为咖啡馆画过广告，后来又去蒙马特的一家美术作坊里作油漆工，他负责的是最后一道工序——用中国漆模仿顾客的姓名描在打火机和香烟盒上，每天干一个上午可得十个法郎，吃饭以外还稍有盈余。

在他补习法文的学校里，一天艾青正在本子上写诗，坐在他前排的一个丹麦姑娘回头瞧见了，惊讶他说：“你是诗人！”

这位丹麦姑娘后来到英国上大学去了，到英国后还给艾青写过信。艾青没有回信，不久连名字也忘记了。那时的艾青，对于女性还是迟钝的，他面前的迷雾太多了——人生与社会都是如此。

艾青是在巴黎认识后来成为挚友的李又然的。

在巴黎第六区浮世哈姆大街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艾青发现时常有一个同胞在饭桌边坐着。恒，他的面前既没有饭，也没有菜——一碟很便宜的、数量少得可怜的小菜，虽然省俭着吃，也终于吃完了——连一碗汤、几片面包也没有——这就是饥饿中的李又然。艾青坐过去，要了饭菜，什么多余的话也没有，只说了一句：“吃吧！我每天有十个法郎。”

两个人一起走出饭店，在马路上，艾青又给李又然十张饭票，五十个法郎。

路上，艾青吹着口哨，吹的是一支流行歌曲，很轻松的流行歌曲，在他嘴里不知为什么变得凄凉而沉重了。

从此后，两个人变得难分难舍了。艾青指引着李又然接近艺术，而李又然带艾青去大学听课。艾青说：“以前走过大学像走过教堂一样厌恶，现在也喜欢去去了。”

为了艺术，为了时事，两个人经常吵架，吵得这么凶，今天吵完第二天和好如初，和好之后接着再吵。

艾青是抱着幻想来到巴黎的。

巴黎的郊区有一个玫瑰村，来法国之初艾青曾住过一段时间，那里家家盛开的玫瑰甚至勾起了他的几缕相思：双尖山下，西子湖畔，那也是花的故乡呀！

巴黎有玫瑰，也有小偷、妓女、饿殍。

巴黎大街上的人流，是由各种肤色、各种帽子组成的。然而，有色人种受到的歧视也随时可见，明明贴着空房出租的广告，艾青去时，房主一看：“支那人，房子已经租出了！”

巴黎不仅有罗浮宫、圣母院、埃夫尔铁塔，巴黎的阴影也是到处可见的。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但，巴黎毕竟是巴黎公社的故乡。

巴黎人谈吐既讲礼貌也比较随便，还有善于幽默、爱开玩笑的乐观主义，对于艾青这样一个流浪者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并且觉得有一种流浪汉式的温暖。

在艾青的回忆中，这座城市是巨大的、开放的、好客的、幽默的、五光十色的，布满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足迹的；但，同时也是到处都能找到病态、不平等和嘈杂的城市。

当时，法国的数不胜数的标榜着现代派、浪漫派等各种流派的“艺术沙龙”还没有注意到艾青这样一个人——他还是个满腹才情却又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但，应该说，巴黎那浓郁的艺术气息是熏陶了他的。他的法文并不好，却有很强的理解力。他读了一些法国的文学作品——除了醉心于凡尔哈仑的诗以外、除了继续注意俄国的屠格涅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人的诗作以外。

法国，是 20 世纪的文化、艺术的中心。

不妨说，艾青是涌向这中心的潮流之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滴——而在他离去之后，这小水滴经历了水滴石穿的磨练，终于独自流出了自己的迷人的航程。而当细心的读者仔细研读一番法国 19 世纪的文学，便会有趣地发现，在那里，也有一个文笔与思想比较接近、怀着“永远孤独的命运感”而献身于法国的文学事业的诗人——沙尔·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的著名诗集——《恶之花》一作者为此吃过官司，作品也曾被禁过——但，雨果却大声赞扬它是“光辉夺目的新星”。这一本开创了法国近代诗歌新时代的诗集，艾青在巴黎时读到了，并从中得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启示。艾青读《恶之花》的时候，波德莱尔已在六十一年前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与凡尔哈仑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波德莱尔寻求的、锐利地反映的是诗人对巴黎社会的畸形、肮脏一面的讽刺和挖苦，对腐朽、传统的世俗习气的鞭笞——诗人的对美的追求是通过描写丑恶来反映和体现的——是“自由、细腻、辛辣。”

读一读《陌生人》吧，这短小的诗行间，读者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波德莱尔的心的跳动，以及他的几乎无处不在的思维的触角——

——喂！你这位不可猜测的人，你说说你最爱谁呢？你父亲还是你母亲？姐妹还是兄弟？，——哦……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那朋友呢？

——这……你说出了一个我至今还一无所知的词儿。

——你的祖国呢？

——我甚至不知道她座落在什么方位。

——那美呢？

——这我会倾心地相爱，美是女神和不朽的……

——金子呢？

——我恨它，就像你恨上帝一样。

——啊呀！你究竟爱什么呀？你这个不同寻常的陌生人。

——我爱云……匆匆飘过的浮云……那边……美妙奇特的云！

他好像是不知所爱的。其实，他的爱在当时很难为世人所接受、所理解：他好像连祖国的方位都不清楚的，其实，那也恰恰说明他有着更深沉，更博大、更带有理想色彩的爱。

再也没有比“西生人”更孤独的了。

艾青在巴黎，恰恰也是个陌生人，也是个孤独。

自然，波德莱尔和艾青是两个国度的人，又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最明显的是艾青后来选择的一条走向太阳、举起火把的道路，从而使自己融进了革命的潮流。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两位诗人在心灵某一点上的相通之处。

艾青是不会忘记巴黎的。

艾青是爱着巴黎的。

艾青的雇主，那一个作坊店的老板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越南人，母亲是法国人，老板学过拳击，身上长着毛，对雇工的态度是很粗野的。也许艾青还算是兢兢业业地为他干活的吧？所以他对艾青还是客气的，总是称为“先生”。在半天的活儿干完后，很痛快地把十个法郎送到艾青手，笑嘻嘻地耸耸肩膀，道一声再见。

时间是充裕的，艾青除了逛逛大街、看看电影外，酒吧间和夜总会是从不涉足的。艾青说：“我瞧不起这些地方。”

最使他醉心、并从中得到最多的启发和诱寻的，还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作。

凡尔哈仑笔下，城市的畸形繁荣，宁静的乡村的画面，对于他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凡尔哈仑的浓重的忧郁的笔调，在艾青的忧郁的心灵上，如击鼓的重槌捶下，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马雅柯夫斯基、叶赛宁的作品也相继向他走来。

流浪者的艾青的心里，有了一种更为深广的不安宁。

他不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唱着忧郁的歌的流浪者了！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一样传到巴黎。

艾青，这个并没有济世之志，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第一次被逼近了的亡国之耻、亡国之痛煎熬着、折磨着。

一天，艾青早早地从他寄居的那一家葡萄牙人开的旅馆的过道小屋里走出，到巴黎近郊一个僻静的所在去写生。

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多么真诚，多么可爱、多么清醒的一个法国朋友）在艾青身边踉踉跄跄地站住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便是大声地嚷：“中国

人，国家快完了，你还在这儿画画！”艾青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之后，仍然记得这句话，他说：“一句话，就像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他从沉缅于艺术的迷宫，他从向往着流浪的天真里，跨出了对他来说是无异于里程碑式的一步：1982年1月16日，“世界反帝大同盟”在巴黎召开了“东方支部”的成立大会，艾青出席了会议，并加入了这个组织，那“温和的、激烈的、爆炸的”发言，以及爱国者们身后拖着“深暗的、悲哀的黑影”使艾青的心燃烧了！

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人，还有另外一种生活。

那是一些苦难的人，那是一种苦难的生活，然而，因为他们有理想，有目标，为大众、这苦难便也成了幸福，这遥远便也成了亲近。

在这次大会后，艾青与诗邂逅相遇，从此便一往情深。

艾青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首诗：《会合》——东方支部的会合。

诗人的第一个脚印，是在他流浪的异国留下的。

诚实的历史对于诚实的艾青的最好的表彰是：当多少年以后，这一首蒙上厚厚的岁月的灰尘的诗，被后来者重新发现时，依然充满了自由与解放的魅力。

作为诗人的艾青，他的真挚、执着，是从第一首诗开始的。

“温和的、激烈的、爆炸的”发言声的描述，就可见一斑——革命者也是有温文尔雅的。

他的优郁是他的诗人的天性中的一部分，是他所追求的“真、善、美”中流动着的感情色彩的一部分，是由艾青的性格和心灵灌注的优郁美。

艾青要回国了。

如同他的决然出走一样，他要回去了。

他回去时的迷茫几乎与他出来时的迷茫相等。

他是为学画画来巴黎的，他回去时不能说已经功成名就。至于回去以后做什么，也实在不得而知。但，烧灼在他心里的亡国之痛却是要比先前更强烈了！

那一个喝醉了酒的法国人，时常会踉踉跄跄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要回去了，他只是感到祖国在召唤。

那时，李又然仍旧穷困着，上顿不接下顿。艾青一方面劝他先做做小工图个生计，一方面把自己路费之外的剩余，全部给了李又然。李又然体谅到艾青回国以后依然是路途遥远而崎岖，一切都在未定之数，执意不收。两个好朋友为此而闹得面红耳赤。

艾青深知朋友的困境，便说：“我把钱放在马路上了，管你要不要！”

哪知李又然和艾青一样扬长而去，艾青无法，只好回头把钱重新拾起。

从巴黎列马赛的路上，艾青轻声地哼着马赛曲。

他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他渴望着回到故国，故乡——那里终究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想象着日本军队的刺刀与炮火，而中国的土地——神圣的土地，却被一只只带血的靴子践踏着。

活鲜的小草没有了。

陪伴过他的童年的双尖山下的竹园烧焦了。

紧紧地关闭着、沉闷着的战士啊，人民从来得不到新鲜空气的故土阿，像铁屋子一样的故土啊，现在却由侵略者的手撕开了！

也许，在他回回国以后仍然是个流浪者，但是他将和自己的人民一起流浪。

也许，在他回国以后仍然要摆弄画笔，但，他将为自己的人民绘出心灵。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仍然要回去。流浪、流浪……

别了，玫瑰。

别了，作坊。

别了，画室。

别了，自来水管通过房间的小小的过道房。

别了，已经记不起名字的那一位丹麦姑娘。

别了，别了，巴黎！

三年，他刚刚认识巴黎，而巴黎也许还不认识他。

三年，贫困而自由的三年啊！

三年，心灵的重压像石一样堆砌的三年啊！三年，结识了“反帝大同盟”，也结识了诗的三年啊！

三年，学会了以自己的姿态，吹着那一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的三年啊！

一个注重感情，一个渴望着了解世界、一个在巴黎生活了三年的人要走了，他对法兰西是充满着依依惜别的深情的。从巴黎去马赛的途中，他写下了第二首诗：《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绿的草原，

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鲜的乳液似的烟……

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

田野是多么新鲜！

微黄的灯光，

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时间。

看！

在这一首诗里，读者所看到的凡尔哈仑的影子倒是比较远了，而艾青自己的特点却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出来：他是注重形象的，他是讲究色彩的，他是追求内在的音韵和新鲜的比喻的。巧妙的叠句，蕴藉的意境，在平凡与素朴中流露出来的惊人之笔，这一切都是属于艾青自己的——艾青的第二首诗实质上就已经宣告了，作为诗人的艾青的无可争辩的存在，以至人们在半个世纪后重读时，仍然不能不为诗人的奇特的想象、娴熟的技巧而惊讶！

流浪汉似的艾青，其实也一样向往着宁静与安详的。

牧歌似的黎明，为大地上的跋涉者与耕耘者所有的黎明，艾青心中的黎明啊！

那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这样的黎明。

1932年1月28日，是艾青从马赛启程回国的日子，也正是日本军阀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一天。

船行在苏伊士运河上，远方的风所带来的远方的呻吟，是来自祖国的。其时，上海战争已经爆发。在甲板上，艾青所听见的不是拍击着船舷的涛声，而是枪炮的呼啸，是一个被欺压的弱小民族的再也不能延误的呼救与呐喊！

三年前，也是在这一条航道上，也是在这样的风浪里，艾青回首间，已是去国万里，能不柔肠寸断？所多的是徬徨与迷乱。

三年啊，巴黎的玫瑰与醉汉！

玫瑰之于艾青是并不陌生的，在中国，至少明清两代是把它当作“国花”的；但，艾青对于花的喜爱，却并没有特别的兴趣，顶有时却更喜欢草叶，树根乃至山野中的各种形状的顽石。

可是，这个醉汉的跌映撞撞的形象，是再也不会离开了，他的耳畔时常响彻着这样的声音：中国人！……

三年后，还是在这一条航道上，还是在这样的风浪里，艾青回来了。一样天涯路远，依然两袖清风，所多的是忧虑及愤慨。

艾青好像预感到了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他正在走向民族救亡斗争的浪潮之中，是毫无疑问的。

既不会有一个属于他的平静的书斋，

也不会有一间属于他的小小的画室。

额头上的两道浅浅的皱纹，取代了他三年前的天真。

他的脚下，他的面前，是无数个喧嚣的浪头；而在阻挡着无边的浪头的岸边，还有大沙漠，还有沙漠上的旅人，以及沉重而不屈地缓缓移动着的驼峰……

艾青和几个同学，为了这一艘法国邮轮上伙食的低劣，与船长进行了交涉。

船长的嘲弄刺痛了艾青的心：“你们中国没有人，尽挨日本人打！”

“我们有红军！”艾青睁大了含泪的双眼，愤怒地向法国船长咆哮着——船长，邮轮，以及大洋都为之静穆了——中国，是不会永远沉默的；中国的声音——无论是抗战的枪声，还是诗人的呼喊，终有一天会传遍世界的。

不能说，在那个时候艾青就迫切地向往红军、向往着中国共产党了。他知道是党领导的红军在艰难地抗日，这是真的，而艾青自己也是从心底里表示敬重的。然而从这一句“我们有红军”的呼喊开始，历尽坎坷，最后终于成为红军与共产党的一员，这对于艾青来说，并非是偶然的。历史的潮流正在推动着艾青。

船靠上海码头，正是江南春早时。

劫后余生的几株柳树，在料峭春寒中绽出了米粒大的新芽，而更多的是弹洞残壁！

“到上海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艾青哭了。

这个不愿意流泪的人，从此，眼里时常含着泪水了。三年，三年之后，祖国、民族以及他的江南故乡，更加苍白了！

就连春天也是凄苦的！

没有早莺争暖树，也没有新燕啄春泥。

艾青哭了。那已经不只是流浪者的思乡的眼泪了。——黄浦江，你是见过艾青的，你说呢？

第三章 监狱中的成名作

在上海，蒋青加入了“左翼美术家联盟”。

他和江丰，力扬一起，组织了一个“春地艺术社”——在1932年的黑暗的、纸醉金迷的大上海——他们希望以画笔告诉人们：哪儿才是春天，春地。

春地艺术社由艾青取名。力扬手书的一块木牌挂上了西门路丰裕里四号的门口。

一块耕耘者的土地呀！

一处理想中的土地呀！

一片奋斗着的土地呀！

一个陋室，只有一桌一凳一块小黑板。

春地艺术社的第一个有影响的，引起了鲁迅、冯雪峰等人瞩目的活动，是“春地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中，有鲁迅先生珍藏的珂勒惠支的《农民战争》、《织工暴动》两幅名作，有江丰的《码头工人》、《穷人之家》。艾青送展的，是从自己拍纸簿上撕下的属于抽象派的一幅画稿，署名“义伽”。

开幕的当天下午，鲁迅偕同许广平、海婴专程赶到八仙桥未看画展，陪同鲁迅的是艾青。鲁迅不知“义伽”为何人，在那一幅画前沉思片刻后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

“是原作。”艾青说。

“是原作那就算了。”鲁迅说。

也许，先生是想买下这幅画的。而为着鲁迅的亲临，既欣然也难免拘谨的艾青，后来一直抱怨自己的“当头呆”——为什么竭想不到把这幅画送给鲁迅先生呢？

无论是对于艾青，或对于中国的文学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画展开办之前，鲁迅就捐赠大洋二十元，以为资助的。参观的那一天，先生又当场捐献五元，艾青并出收余后，鲁迅随即把收条揉成一个小纸团，丢到了墙角里。

画展之后，江丰、艾青、力扬等人均被法国巡捕抓走入狱，监押于逢德路和思南路交界的法属第二着看守所。

艾青的囚号为“p95504”，判有期徒刑六年。

身陷囹圄，对于艾青来说，无异于是暗夜中忽然看见了一处炬火，沉闷太久之后听见的一声惊雷。他像忽然长出了很多见识似的，彻底地明白了：在一个权力不属于人民的国度里，是没有艺术自由的！

艾青是被当作领袖抓进去的。巡捕要捆他，艾青反抗；巡捕动手打他，艾青当然不是对手。

一具石膏头像成了罪证。

“这是什么？”法官问。

“石膏像。”艾青答。

“做什么的？”

“画画的。”

中国人为着中国的前途所作的一点奋斗的结果是：关进了在中国土地上的法国人的牢房。

殖民地的耻辱呀！

国破家亡的印记呀！

然而，监狱的外面，在达官贵人的高楼深院里，在“大世界”、“新世界”、“真正大世界”那些名目繁多的游乐场里，所多的是升平歌舞，所多的是鸦片吗啡……

杀人者，希望这个世界是血肉横飞的世界。

吸毒者，希望这个世界是烂醉如泥的世界。

但，烧毁这吃人的旧世界的星星之火，却毕竟已燃烧起来了——在遥远的山野里，在艰辛的跋涉中，也在一处又一处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铁窗牢狱之中……

在监狱里，艾青卧病了——他得的是在当时十分可怕的肺病——日渐消瘦，两颊时时泛出不吉祥的桃红色。那时，在巴黎经常饿肚子的李又然也已回到上海。他千方百计弄来治肺病的各种针药，并且同看守监房的法国巡捕交涉道：“把艾青放了！”

“我来替他坐牢！”

“你们反正关一个人就是了！”

法国巡捕一时不知所措，以为这个人是从疯人院里出来的。

没有画夹，没有颜料，只有一笔一纸。艾青在监狱中无法画画，只好随时地记下一点回忆、思想、情绪——这监狱，仿佛是艾青最早的诗的摇篮。

在法国他写了第一首诗。

也是在法国，从巴黎去马赛的途中，他写了第二首诗——洋溢的才情，娴熟的技巧，已经有了初初的舒展——虽然，还不为人知。

而现在，则是在法国人为了维护自己殖民者的利益而设的监牢里，艾青和“缪斯”结下了真正的不解之缘。

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

流浪者的艾青，渴望着自然与艺术的艾青，挚爱着故土与人民的艾青，在监狱里——在失去了一切自由的监狱里，第一次真正有意识地、强烈地感觉到了“战士”这个字眼的光荣与职责。

别人是把他当做战士抓起来的。

他要像战士一样，让思想、让感情、让心灵、让呼唤，越过铁窗高墙，走进生他养他爱他的人们中间。

他是忧郁的行吟者，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失望的诗人——当然，在他的一生中也确曾有过悲观、失望的时候。

他是一个强者。

强者，既可以是疾走呼号的；也可以是带点忧郁感伤的。

他忧郁着。

他自强着。

他的忧郁，多半是因为他的真诚，然后才是他的思虑。

他的自强，则是因为他的“骨子”里的不驯服——当他认定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时候，他的所爱与所恨都是无法阻挡的。

他为自己的囚徒生涯，为自己的疾病写过诗，他的惊人的想象力在这样的题材中，一样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我肺结核的暖花房呀

从紫丁香般的肺叶

我吐出了艳凄的红花

像山一样的沉重！

像血一样的纯净！

有谁产生过“紫丁香般的肺叶”的绝妙想象？有，那就是艾青。一个战士，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肝胆，跃然纸上，可谓视死加归了！所不同的是，艾青既是艺术家，就小能用口号去写，就要讲究构思、意境、形象、想象；就有了变丑为美的创造，就有了一种坠人心肠的凝重的美！

难友们都在用嘴对着手呵气了。

几朵雪花撞在铁窗上，溶化了。

“下雪了！”

自由自在的雪花。

飘飘荡荡的雪花。

艾青看着雪花，想起了一句记不起谁说的，关于自由的高言：云在青天水在瓶。

想起了黑格尔的话：心灵是可以涵盖一切的。

只要心灵是自由的，还怕什么禁锢呢？

可怕的是眼睛不再发光，而还去乞求语言。

艾青看到了双尖山。

艾青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以及一直以为他去法国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却又一文不名地回来、乃至坐牢而捶胸顿足的父亲。

艾青的心里，站起来了一个抚慰着他的奶妈的影予：大堰河。

仿佛只是为了了一种执着的纪念。仿佛只是为了写下过去的岁月。

仿佛只是为了对乳汁的眷恋。

仿佛只是为了对母爱的崇敬……

仿佛不是在写诗，而只是在心里要为大堰河塑一个雕像——一切都是新鲜的、苦涩的、历历在目的呀！艾青是用眼神和读者对话，艾青是用心灵向读者倾诉：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技上的衣服上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
因为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进、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
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
她死时，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在监狱的不眠之夜中，倚着冰冷的墙壁、艾青借着铁栅栏外的昏暗的灯光，在拍纸簿上写着、写着。他力求字迹端正，他从来不喜欢潦草、杂乱；但灯光实在太暗了，有时写着、写着就把两句诗叠在一起了，只有等天亮再把它们拆开、重抄。

就在《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写成后，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他第一次用了一个新的笔名：艾青。

诗稿写成后，艾青的心里是异乎寻常地难以平静的，如同是流浪者找到了归宿，苦苦地寻觅之后发现了柳暗花明一样，艾青与诗歌由先前的若即若

离变成了心心相印。不仅如此，因为对于这个死去的乳妈的怀念，艾青仿佛也明白了活着的人应该怎样地走一条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路。

他在监狱里轻声地把诗念给难友们听，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艾青的最早的读者，为之感动了。

流着眼泪写完这首诗的艾青，又流着眼泪读完了它。

《大堰河——我的保姆》写成后，由探监的沈钧儒带给李又然，李又然随即寄往庄启东、方士人编的《春光》杂志，掲載于1933年第三期。这首诗的发表，震动了中国诗坛，人们纷纷为之感奋，为之落泪，为之叫好，并且很快传到了日本。艾青一举成名。这对于艾青来说，多少是有点儿出乎意外的。因为：他并不想完全脱离他所爱好的画画的事业，他并没有期望过这首诗的巨大的成功，但他却成功了。从此与画夹、颜料作别，潜心于形象思维，苦苦地以诗歌去再现、塑造多种形象，去画布之外更广阔的天地中驰骋想象。

这首诗也曾寄给过《现代》杂志，后来退稿了。李又然曾经不胜感慨过：自诩为现代派的人，也终于没有能发现现代的一个真正的诗的新星！

在画家艾青还鲜为人知的时候，诗人艾青却已经开始蜚声文坛了。

随着《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流传，艾青这个名字也不腔而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艾青得到过“桂冠诗人”、“泰斗”的称誉，艾青也曾经像“痰盂”那样，被众多的诬陷、谩骂所凌辱。

30年代的上海文坛，因为由鲁迅及追随他的一批左翼人士支撑着、奋斗着，所以虽是在国民党、汉奸、特务的重压之下、罗网之中，也还是演出了不少有声有色的“话剧”的，并十分重视生力军的发现和培养。艾青的第一首诗《会合》的发表，是坐牢前由田间拿走、寄出的。最早写文章称赞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是茅盾，冯雪峰、胡风等人也都曾热情地关注过艾青的创作。那时，这些文学青年的准则是简单而明白的：哪儿发表鲁迅的文章，咱们就往哪儿投稿！

从此后，“母鸡”便开始接连不断地下起了“鸭蛋”。从此后，艾青再也没有怀疑过自己写诗的天分与才华——哪怕在生活中最沉重的、不让写作的年代里——因而，他总是在探索，总是在收获。

《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所吐露出来的诗人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成熟，形式上的无拘无束，乃至遣词造句的准确、简练，都使人感到，这似乎不应该是艾青早期的作品，然而又的确是。

与很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不一样的是：艾青是在极高的起点上起步的；艾青是吸取了西方文学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法来丰富自己的，艾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写作的；艾青是从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出发的；艾青是从自己十分鲜明的艺术个性走上中国诗坛的。

从此以后，艾青就进入了作为一个作家或诗人一般都要经过相当长的艺术实践才能得到的这种称誉：“这就是艾青！”“这就是艾青的诗。”

抒情的，但不是苍白的自我。

时代的，但不是概念的堆砌。

革命的，但不是口号的重复。

对“大堰河”，艾青远远地离开了一般的同情和怜悯，他是把这个穷苦的农妇当作生身母亲的，同时又时时地和自己真正的生身母亲相联系、相比较着。

“白描”的功夫，朴素的魅力，真实的力量，没有遮掩的感情，毫不做作的语言，在这首诗里互为衬托，相映生辉。并且，作为艺术特点，一直贯串在艾青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真是谈何容易！

那个粗鲁的农妇，她的有着裂缝的手，还有乌黑的酱碗，乌黑的饭桌，以及她的身上长着虱子的丈夫和儿子们，在艾青笔下，无不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善良，那么感人，那么有声有色！

“形象的力量！

感情的力量！

想象的力量！

是写给千千万万个受苦受难而又善良俭朴的母亲的、是写给自己的弟兄——“大堰河”的儿子们的、也是写给这个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囚徒”的艾青，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了。

诗人的艾青，已经是一个属于千千万万劳动大众的、人民的儿子了。

至于家庭——这个旧式的封建地主的家庭——艾青是这样看待的：

把自己的家庭，
当做旅行休息的客栈，
用看秽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遗产。

艾青并没有宣布过和父母亲脱离关系——在他看来，也许是有必要的。

艾青出狱后的旅费也是他父亲寄的——他不止一次地从父亲手里“骗”过一些钱——为了活命，为了远走重洋去法国。

但，他是他父母，以及他父母所隶属的阶级的“克星”，却是毫无疑问的——尽管，他不会故作姿态地大声疾呼。

《大堰河——我的保姆》写成后不久，艾青被押解到苏州监狱服刑。

随他而去的囚徒的最简单的行李中，有一本他用来写诗的拍纸簿。

姑苏——这是古诗人梦魂牵绕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地方。

而今，写诗的办徒——艾青也来了。

前后三年的监狱生活，对于艾青来说，是在诗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三年，铁窗牢狱的制造者，是实在也想不到这里会培养出战士与诗人来的。

第四章 少年艾青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当回忆的桦皮船，在时间的潮流中逆水而行、并且越走越远的时候，岁月的尘封会愈积愈厚，但，回忆将会变得单纯而明晰，就像人人都有过的孩提时代的那一对眸子，以及从这样的眸子里所看到的那一个世界。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通常是：

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经历。

最纯净的，和最肮脏的事物。

最美的，和最丑的。

在岁月的回音壁上，还能听见艾青的第一声啼哭吗？

所有的伟人与凡人，今人与古人，都是以各自的哭声而宣告自己的降临于世的。有人据此说，人生所多的是苦难，倘不为什么生下时只会哭而不会笑呢？

这哭声，是向着人世发出的第一声呼唤，却是千真万确的，也是对母体眷恋的最后的告别。在所有的孩子的哭叫里，我们都能听见这样的声音：

我来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给我空气！

给我奶汁！

给我一条路！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这第一声啼哭，对于母亲和孩子往往都是急迫的，都是期待已久的，是痛苦之中的慰藉，是血污之中的希望。

艾青的哭声是姗姗来迟的。

他似乎是不太愿意来到人间。

人间也似乎不太欢迎他的到来。

他是少见的难产，挣扎了三天三夜才出生的。

他的哭声是尖利的，仿佛还带着抱怨与愤怒。

然而，艾青也奇迹一样地活下来了——经历了几乎窒息的痛苦，在医学落后，迷信盛行的 1910 年 3 月 27 日的浙江金华畷田蒋村——在接生婆的没有经过消毒的、忙乱的刀剪声中——艾青落地了。

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

他的父亲叫蒋忠樽，母亲名楼仙筹。

他出生时，家里富足有余，除了有土地、佃农，祖父还有小老婆之外，并有祖上传下来的店铺两处——“永福祥”酱油店，“蒋贤兴”南货店。这两个店铺都是由几家合资经营的，艾青家是股东之一。

艾青是一个地主的儿子。

艾青又是一个饱尝了地主阶级封建迷信之害的农民的儿子。

艾青一落地，不祥的命运便跟踪而至。

因为难产，乡村里一个不负责任的算命先生施展骗术，沉重而又忧虑地告诉艾青的父亲：这个孩子是为了“克父母”而出生到人间的。

“克”者，“克星”之谓也。

“克”父亲的结果，是父母都要早死，死期不远，大难将至。

也有解救的办法：赶紧流放出去，万不可吃生母的一口奶，长大以后也只好叫父母为“叔叔、婶婶”。这位算命先生信口雌黄的妙计原来也只是以假乱真法。

然而，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混饭吃的江湖术士的话，却成了艾青一生之中相当一部分岁月的预言——把他当作“克星”的，又岂止他父母二人？

流放的生涯又岂止是孩提时代？

祸也？

福也？

艾青的父母——生身父母，从此便把艾青当作“怪物”，当作“克星”；艾青的出生使这个富裕、安乐、逍遥的地主家庭，笼罩着一片阴云和忧愁，乃至食无味，寝不安。

父亲怒目。

母亲长吁。

在怒目之下，长吁声中，艾青被送到了—一个农妇家中寄养。这是个贫穷而卑微的农妇。

她连名字也没有，人们就以她居住的村庄所在地作为她的名字，叫她“大堰河”。

她是用战战兢兢的手，接过包裹着的艾青的。

她习惯地把艾青偎依在胸前，扯开衣襟，把乳头塞到了艾青的嘴里。

吮奶的艾青看见了大堰河。艾青平静了，不再大哭大闹了。

她用自己的奶水，用善良的母爱，抚育着艾青。

大堰河的粗壮的手掌，每天都要在艾青的小脸蛋上留下抚爱的印记。

大堰河用干裂的嘴唇，吻着艾青——这是艾青来到人世间后得到的第一个吻。

大堰河家的草棚，以及简单、粗糙的家具，都是朴实而亲切的。

贫苦农民的粗茶淡饭，使艾青长大了，会说话了，能走路了。

大堰河宠爱着艾青。

这一种宠爱，固然有艾青毕竟是地主少爷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中国底层的穷苦农民的善良，以及母爱的执拗。

既然艾青是“怪物”，既然艾青能“克父母”，又为什么不能“克”一下大堰河呢？

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较之于地主，封建迷信的色彩反而要少一些。所多的是如同泥土一样朴实，如同稻草一样温暖的人情味。

是少得可怜的物质。

是深如汪洋的厚爱。

他们穷得连裤子也穿不上。

他们并不十分希望自己能长寿百岁。

大堰河的家境是极为困窘的。

她生了五个儿子，有一个经常打她、骂她的丈夫。他们种地、交租，上山砍柴：大堰河则在家带艾青、喂猪、做饭：如此艰辛也难得温饱。

在艾青的记忆中，过年才能吃一次肉，乌黑的饭桌上摆出来的经常是一只乌黑的酱碗。

大堰河对艾青的爱，在更大程度上就跟乡村篱笆下常见的母鸡一样，每

当风雨来临时，便不顾一切地张开翅膀把一只只小鸡护卫好，而自己一任风吹雨打。

艾青是吮饮着大堰河的奶长大的。

母亲的奶汁里都是掺和着母亲的血液的。

这在后来，便成了艾青身上所蕴藏着的农民的朴实的源泉，也是作了大诗人以后的艾青的诗的源泉。

艾青，是以这样的诗句，在他刚刚走向诗坛时，便震动了中国，继之走向世界——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是艾青心目中真正的、唯一的母亲的形象。

母亲的奶汁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她使艾青一辈子没有忘记泥土的伟大。

她使艾青一辈子没有忘记人民的呼声。

艾青的爱真诚是从爱大堰河开始的。

艾青的爱朴实是从爱大堰河开始的。

艾青的爱善良是从爱大堰河开始的。

而艾青的恨封建迷信、恨专横残暴、恨虚伪，则是从恨自己的生身父母开始的。

大堰河，你怎能不教人爱呢？

清早，天还没有亮透，大堰河总是第一个起床，轻轻地为艾青掖好被子，很快地走到灶间，生火做饭，柴火在灶膛里辟辟拍拍地响，大堰河的被太阳晒黑了的脸，只有在这个时候，闪耀着明亮的红光。大堰河，也是很美的呀！

她先用筷子挑几粒米粒尝一尝，饭熟了没有？

她再用那一块千补百纳的揩台布把那张乌黑的饭桌擦一遍。

她趁艾青还没有醒的时候，赶紧抱出几件破衣服缝上几针。

她把藏在破衣服上的虱子一个一个地用手指甲掐死。

她走到鸡棚里，把一只还带着热气的鸡蛋拾起，小心翼翼地放进蛋篮里。

艾青要醒了——她知道——她心里感觉到了。

她赶紧拍一拍围裙上的柴灰。

她要去抱艾青了。

她把奶头塞到嗷嗷待哺的艾青的小嘴里。

两双眼睛对望着，都是甜蜜的，都带着微笑……艾青吃饱了。

丈夫和儿子们搁下饭碗，上山砍柴去了。

大堰河难得清静地抱着艾青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哼着只有她自己和艾青才能听得懂的、很好听的小调。

然后，大堰河把艾青放到用稻草编织的、让孩子在冬天里站着或坐着的“草窝”里。

她含着笑，一边逗艾青，一边洗衣服。

她提着菜篮，把池塘里的冰敲碎，在冰水中洗萝卜。

她用双手使劲地掏猪吃的麦糟。

太阳升高了，她背着团箕去晒大豆和小麦。

她总是急急忙忙地出门。

她总是更加急急忙忙地走回来。

她一进门，便先把艾青抱在怀里，揉着、亲着、搂着，以母亲的爱怜来弥补刚才她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失去的陪伴艾青的时间。

这一切，都是无声无息的呀！

不到一岁，艾青便会“呀呀”学语了。

她多么希望她的乳儿，搂着她的脖子，贴着她的耳根，亲亲热热地叫一声“妈！”

艾青会叫的，艾青怎么能不叫呢？——他只有这一个用奶汁与心血把他养大的母亲。

艾青叫她“妈”的时候，她会在艾青的脸蛋上亲了又亲。

大堰河在村子里逢人便夸自己的乳儿：“他会叫‘妈’了！”

“他真的叫我‘妈’了！”

大堰河，这个穷苦的农妇，这个善良的母亲，这个被生活的重担早已断送了青春的女人，一样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希望和梦幻。

这种希望与梦幻，是和艾青联系在一起的。

她曾面对着和她躺在一个被窝里的小小的艾青，诉说过这样一个梦：

“艾青长大了。

艾青成婚了。

艾青居然还没有忘记她。

艾青把新娘子叫到身边，指着大堰河说：“这是我的妈。”新娘子羞怯地叫了一声：“婆婆。”

大堰河的一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

大堰河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大堰河醒了。

大堰河的身边，艾青睡得正香……

后来，在大堰河诉说这个梦的时候，艾青是安静地听着的。艾青，你听懂了吗？

那么，在大堰河的温暖的怀抱里，艾青有过多少儿时的梦？在满村都飘香的、油菜开花的时节，玩土的艾青想到过泥土的奇妙吗？

那一处可以玩水，可以放行芦叶船的池塘，在照见过艾青影子的同时，曾育过关于未来的风浪的暗示吗？

他幻想过有一副小鸟的翅膀吗？

他还做过一个使他放声大哭的梦：他要离开大堰河了，他的生父和生母要把他带回另外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家了。果然，当大堰河以自己的奶水和辛勤，把艾青抚养到五岁时，他的生父与主母要把艾青接走了。在这之前，艾青虽然也知道还有生身父母的存在——但，他们的地位在艾青的心目中，是细如黄沙，轻如鸿毛的。他已经是堰河家的一员了。

他已经习惯于堰河家的粗茶淡饭了。

艾青扯着堰河的衣角——这是他的唯一的靠山，他不想离去。他依恋着堰河身上的母爱——这一种爱，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那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啊！

他冷冷地看着自己的生身父母。

他只有陌生及依稀的害怕。

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

他哭了。

大堰河也哭了……

但，艾青终于被带回自己的家了。

树木葱郁的双尖山下，是艾青家的宅院。

有楼房，有平房，一式的砖木结构，大梁很粗，椽子是排椽。

门口的一块匾上写着：“天伦叙乐”。

坐的凳子是油漆过的。

睡的被子是印着花的。

吃的米饭是碾过几次的。

能常吃到鱼肉，酱碗是看不见的了。

这一切，对于艾青来说，无不因为过于陌生而显得沉重乏味。

他成了他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他是惶惑的。

他是怯生的。他不再能任意地奔跳了。

他甚至也不允许大声地哭，大声地笑了。

没有谁再来抱他、摸他、亲吻他了。

他已经离开大堰河了！

他从纯朴的天地来到了虚伪的世界。

他从自由的王国来到了禁锢的牢笼。

他从温暖的翼下来到了寒冷的冰窟。

他将要长长地面对寒冷与淡漠。

他总是孤独地站在这一个寒冷家庭的门槛上，希望能看到远处。

他的被收回家中，实际上是他后来离家出走，直至背叛这个家庭的开始。

因为，他有了直面家庭，直面人生的机会了。

他开始从社会的一个细胞，想要了解这个不平等、不公道的社会了。

他总是不安分守己。

他赏常做一些被他父亲责备、打骂的事情。

他的小小的反抗，是不理、不睬、不哭。

艾青的被接回家，是因为他的父亲要他丢读书了——尽管，艾青是被视为不吉利的“克星”；但，艾青的父亲还是希望他继承家业，荣宗耀祖——而其时，西方的一些影响，维新的思潮，也正缓慢地、脆弱地传到了浙江金华的这个小小乡村。

蒋忠樽是乡里第一个剪辫子的，并且每每以维新派自居。蒋忠樽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希华”——希望中华民国早早成立的意思；给自己的小女儿取名为“希宁”——希望中华民国得到安宁，他还经常翻阅世界地图，读一点气象学，附庸风雅的时候，还可以画几张画；有时便和村里人说一说猴子是人的老祖宗的新道理。而他本人则是金华府的一个旧制中学堂的毕业生，肚子里又灌满了四书五经。总之，这样一个矛盾的、从本质上代表了地主阶级利益的人，也无可奈何地感觉到了一点点新潮流的不可阻挡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艾青了——当然这一种希望就连他自己也是茫然的、说不清楚的。

1915年，艾青进村蒙馆读了一年多一点的启蒙的书。

后来，畝田蒋村办了乔山小学，艾青即去那里上学，继而又到傅村镇上的育德小学求学，直到小学毕业。1925年考入金华府的省立七中。

小学时代的艾青，个儿算是比较高的，饱满的天庭，清秀的面庞，一双眼睛时时会吐露出忧郁的神色——是聪慧的，但，总像带着什么愁闷及怀疑，或者说在寻找着什么、在企望着什么。

艾青不算是个好学生——虽然，他能不费力地背书、做完作业。

他经常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去，寻找自己的乐趣。

艾青在小学里的美术老师能画画，也会做一些小的手工艺品，还能给当时的现代戏——文明戏画舞台布景，还会制作文房四宝。

艾青的初中一年级的美术老师是国回技艺很高的、学吴昌硕和张书旂。

那时，艾青对于“形象”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他后来毕生苦苦地捕捉形象及形象思维的开始——虽然，最初他是学画画，注意的是绘画的形象。

在畝田蒋村，在艾青求学的学堂周围，所多的是红胶土与小竹林。

红胶土有着鲜艳的色彩，并且还有很强的粘性。

小竹园里使艾青神往的，倒不是那一根根顶长的修竹，而是一节节裸露着的，在扭曲中天然地成了各种形状的竹根。

那时，艾青显然还不知有什么竹雕艺术。但，他却能凭着一把小刀，用竹节做成小小的水桶或奇形怪状的烟斗。

他还能随手将一团红胶土，捏成一个人头，脖子下面插上笔套，耳鼻分明，五官俱全。为了使这个泥人头有一点生气，艾青又从家里偷出一支香烟来，吸一口往泥人肚里喷过去，这小泥人头会顿时七窍生烟的。

他的书包里常常装着竹根与泥人——那些小精灵就这样悄悄地、不动声色地走向他的心灵。

他也常去写生——画农村的风景——那长着小树的山，那盛开着花朵的田野，那些会唱歌的小河……

他陶醉在田野的自然风光里。

他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自由、一种享受。

他得到了安慰。

他以自己笔下的自然景象，来抚慰自己的寒冷的心灵。

对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美术才能，他的父亲是不以为然的。有一次大概是看到了艾青的小泥人吧，蒋忠樽不屑地对艾青说：“把你送到贫民习艺所去吧！”

“贫民习艺所”就是以廉价的贫民劳动力而创造艺术品的廉价的工艺美术作坊。艾青家里一个六角形的竹编透光漆点心匣就是这个作坊的产品，工艺精美，高雅大方——但，那却是贫民创造的——艾青虽然没有去，而他父亲的这句话却像预言一样最终还是在异国巴黎应验了的。

艾青还曾把自己描红的一幅关云长的像托人捎给他的乳妈——大堰河。大堰河是那样的高兴，她把这像看作是吉利的象征，也看作是乳儿在想象着她的信物。

这是孩子时代的艾青送给大堰河唯一的礼物。

使艾青从画画中得到自信的，是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艾青去教会学校看望妹妹蒋希华。艾青离开这所教会学校时，他妹妹的两个女同学在校门口喊了一声：“下次给我们带画来”，艾青回头望时，她们已经逃之夭夭了，妹妹告诉艾青，她们是在一个小小的画展上看见艾青的画的，并且说：“画得好！我真喜欢！”

天赋、才能、以及艾青倔强的性格，更多地给他带来的是老师的责备，是父亲的一个巴掌下来，五个手印顿时绽出的打骂。

艾青，确实是多灾多难的。

他受不了“童子军”的训练，他也看不惯“童子军”老师的蛮横，便在黑饭上写道：童子军三条纪律：吹牛皮，拍马屁，吊膀子。

后被查出，当场受罚，当场受辱。

艾青读小学还没有毕业，“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他第一次听到“科学”、“民主”这样的字眼，是新鲜的，是赏心悦目的。

艾青小学毕业时，语文老师出了作文题“苦旱记”。艾青从未见过旱灾，何况苦旱？他没法写这篇作文，早早地交了白卷便溜之乎也。这一回，中学没有考取不算，还挨了父亲一顿打。

吹牛有理，诚实有罪，在中国，看来是源远流长的！榜上无名后，艾青便由父亲出面送到乡下的一个老先生家里补习功课。读了一个暑假的《左传》，艾青只记得一句：“郑伯克段于鄢。”

一年后，艾青考入省立七中了进中学后老师出的第一道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艾青写了篇名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章，公然反对念文言文，认为胡适与鲁迅的文章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他的语文老师的批语是：“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艾青毫不犹豫地老师的批语上重重地打了个“大八叉”！

“五四运动”以后，整个中国社会——这块冻结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土壤，这座支撑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阁楼，正处于将变未变、山雨欲来风满楼景象之中。

少年艾青的心灵同样也在活跃与变化中跳荡着。

高年级的同学们经常上街游行，摇旗呐喊，捣毁卖日货的商店，冲进卖鸦片的商号……。金华，这个南方的古城似乎不再死气沉沉了！当时，艾青是并不理解这一切的，他只是觉得兴奋，他只是从心底里盼望着变革——变革掉那些封建迷信的枷锁，变革掉那些不劳而获的财主，变革掉那些没有人性、没有温暖的家庭！

一个偶然的会，他又从同学那里看到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

他读着，从一知半解中获得了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知识——就是这些知识，忽而使他觉得天地开阔多了，人生也明朗多了。他自信地以为：在畝田蒋村、在古城金华之外，一定还有很大的世界，还有新鲜的学问。到底还有什么，艾青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总而言之，在很遥远的地方，那属于未来的一切，是要更为吸引人的！

他的地主家庭的出身，他的很少有人情味的父亲与母亲，他的给了他爱与奶汁的乳妈大堰河，他的天性中的忧郁，他的对大自然的爱好、对美的追求，以及那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这一切像影子似地跟随着他，构成了他一生的事业，沉浮和悲欢离合。

他开始更加明显地显示出，他是一个反叛的逆子了，他具有反叛的性格和力量。

五岁以后——那还是十分需要父爱与母爱的保护、温存的时候——艾青得到的却常常是父亲的凶狠的巴掌甚至拳头。

挨打以后，他从来不哭，只是面壁而立，有时可以一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他久久地盯着墙壁。

他希望能看透一些壁垒。

他只是把屁股对着他的父亲和母亲。

他不哭。

他十分珍惜自己的眼泪——尽管，他在后来投身革命后，为了灾难深重的土地，是时常眼里含着泪水的。

他一生中蒙受的冤屈、耻辱与惩罚，是由他的父母开始无情地给予的。

他从小就有含冤忍辱的经历。

他从小就有含辛茹苦的体验。

艾青已经是个小学生的時候，有一天，院子里一只飞来飞去的麻雀突然将一泡屎撒在蒋忠樽的头顶上。这在南方农村，是被视为不吉利的征兆的，更何况还有个“克星”的儿子就在身边呢？艾青的父亲坐立不安了，当时就变了脸色，似乎大难将要来临。蒋忠樽毕竟是读过书的，也知道怎么消灾祈福：要用七家人家的茶叶泡茶喝下，这雀屎之祸才可保无虞。于是，他拿出一只茶碗，要艾青去讨七家的茶叶，艾青不去，厉声训斥之下，艾青依然不从。蒋忠樽便飞起右手，把一只茶碗像泰山压顶一样砸碎在艾青的头顶上，鲜血马上流了一脸……

艾青宁可面壁，就是不去，就是不哭。

他从小就不会讨好。

他从小就不会求饶。

还是艾青祖父的小老婆，看见殷红的鲜血直往下淌，吓得大叫：要死人了！要死人了！让人用香炉灰将伤口堵牢，止住了流血。

但，又有谁能看见，艾青的小小的心灵正在流血呢？

艾青 15 岁的时候，已经是个堂堂正正的英俊少年了，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艾青还挨了父亲的一次毒打——也是最后一次挨打。

南方的冬天——至少在金华一带的江浙所在地，一样是寒冷的。有钱人家里，总是要生好几只“火篮”，用来烤火取暖。那一天艾青和妹妹希宁在一起烤火，艾青心血来潮要表现一下翻“火篮”的技巧一把“火篮”放在手中翻动一周，火星居然不会掉下。妹妹钦佩之余也学着翻了一下，可惜技巧不佳，把火星做到脖子里去了。艾青的父亲闻声从里屋大步走出，不分青红皂白，将艾青一顿拳打脚踢！

打完之后，蒋忠樽便扬长而去了。

就在蒋忠樽满意地惩罚了自己的儿子之后，却丝毫没有想到艾青将会用怎样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反抗的。

即便是在一个家庭，暴力的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威严与权势，其实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捅便破的。

就这样，艾青决心要从“面壁而立”的消极反抗，转为“发出呼声”的积极反抗。

艾青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白纸，上书“父贼打我”四个有力的毛笔字，偷偷地放到了父亲常用的一只抽屉里。

后来，蒋忠樽看见了。

他问艾青：“是你写的吗？”

艾青一边准备挨打，一边毫不隐讳地承认：“是我写的”——艾青信仰的是诚实。

奇怪的是，父亲只是笑了一笑，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打过艾青——虽然，阴沉着脸的事情是经常有的。

“父亲也害怕反抗。”这是艾青由此得出的经验和结论。

艾青的母亲并不自己动手打艾青，但，也从不阻止丈夫打艾青。

她也是把艾青当作“克星”的。

艾青的母亲不识字，但，很聪明，会说很多俏皮话，有幽默感。

她会用很好的比喻。

在她说到一个头发稀疏的秃顶的邻居时，是这样形容的：好像用几根稻草捆住了一个大西瓜。

艾青的父亲有一双很大的眼睛，艾青的母亲是这样夸张的：“芥菜籽落到他眼睛里也看不见的。”

艾青长大后，她告诫艾青不要找长得漂亮的老婆时，用的是多少带点粗俗，也多少带点哲理的语言：‘灯一吹，天堂和草屋是一个样的！’

这使人想起：艾青的幽默，或许与他的生身母亲有关。但，艾青没有遵从母训是毫无疑问的——对于美的追求，他是执着而真诚的。他也决不会去找一个丑女作自己的妻子。

艾青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在畈田蒋村，在小城金华，在中国南方的那一片沉寂、古老的土地上，少年艾青将要走上人生的另外一段旅程了。

不知道前方有没有路。

不知道今后走向哪里。

但，他已经是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青年了。青春，这个在多少诗人笔下赞美过的字眼，现在，要由艾青来品尝它的甜酸苦辣了！对于艾青来说，青春既不是同学少年的豪情壮志，也不是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当时，他还不是诗人，但，他将要走向的，却是一条富有独创性的、艰难的诗人的道路！

因为生活的潮头和偶然的机遇，中华民族可以因之而自豪的一个大诗人的最初脚印，像流浪者一样颠簸着，期冀着、痛苦着、希望着，要走向远方。

他爱故乡。

他爱红土、竹节。

他爱朴素的大自然。

他爱一个农民的母亲。

他恨那个地主的父亲。

他要带着他的爱和恨，他要凭借着爱和恨的力量，去探索人生的道路。

他的父亲所希望于艾青的，是学会经商、做生意，是面带笑容地把别人手中的钱赚到自己家里来。即便赚不了钱，能不多不少地保持这份家业也可以，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就像臣民往往不忠于皇上一样，艾青是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的。

他的艺术的天性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他的心灵——走出去，走到很远的地方去！”

行路是艰难的，尤其是像艾青这样的孤独者的行旅。然而，他的后来跻身于希克梅特、聂鲁达等世界一代名流之列，以及爱情与事业上的一波三折、悲欢离合，却都是由此开始的。

未来啊，你在哪里？

第五章 西湖的忧郁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个迷惘的少年，面对着一个迷惘的中国。

1928年7月，艾青初中毕业，考进了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

他的油画老师是王月芝。中国画老师是潘天寿。水彩画老师是孙福熙。院长是著名国画家林凤眠。

他终于离开那个陌生的家、陌生的父母亲了。他也不用再担心父亲随时可能发作的大声训斥了。

他用不着偷偷摸摸地丢双尖山画画、写生了。

他多少觉得有一点儿自由了！

七月的西湖绿柳成荫，鸟语花香。

荷花开得正红，一朵朵婷婷玉立在碧波绿叶之间，发出迷人的、诱人的微笑。

湖面上一阵阵热风吹来，“知了”却躲在人们看不见的树枝上，不厌其烦地唱着那一支在中国土地上最古老的歌曲。灵隐，倒是个清静的去处，可惜离开学校太远。岳坟，是艾青常去的，那一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对联，在少年艾青的心里，搅起过无限的凄凉与酸楚……

西湖，以它特有的自然与人工的美，以及各种历史古迹，一起呈现在艾青面前。

他想投身于艺术。

他期冀着在艺术的魅力感化别人之前，先感化自己。

他希望从艺术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

每天，在早晨吃稀饭之前，无论是水天一色的晴日，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日子，艾青总是踽踽独行在湖边；有时，还背着画夹，远足到孤山的树林里，农村的田野上。

他靠着小树写生的时候，自己仿佛也长成了一棵小树；他会凝视着一朵野生的、美丽的小黄花流连忘返；还有树上的小雀，天上的流云，都能牵动着他的画笔，他的心。

苏堤上的一枝红挑一枝柳，孤山下的各种野生的树木、小草、山花，互相竞争着，也互相攀援着、辉映着。以它们各自的身姿，像粗细不一的线条，构成了一幅自然界的和谐的图画。

杭州临近钱塘江，夏秋之日，早晨与黄昏常常有浓浓的雾气，在飘忽与迷蒙中闪过各种人的各种心灵。艾青是喜欢这种带着野气的景色的，他自己不也就是飘泊着的流浪者吗？傍晚，夕阳从宝俣塔尖下跌下山时，那幻变的火烧云和昏暗中带着辉煌的天色，也常常使少年艾青伫足而立，翘首而望。

他想到了什么？

他期待着什么？

他陶醉过。

他也迷惘过。

他迷惘于艺术之路竟是那样的遥远，而又不知如何从足下开始。

他迷惘于人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孤独与凄凉，而又不知火光在哪里？

他迷惘于这美丽的西子湖的空虚——离它不远的乡下，农舍是破旧的，

农人的儿女是污垢满面的。

他迷惘于这已经为革命的潮流所动荡着的中国，那些灯红酒绿的富人，那些做牛做马的衣人，却似乎都是安详的——生活是板结的。

他的迷惘太多了。

他把迷惘溶化到了自己的画夹中。

他总是爱用灰色、用灰暗的调子去构思每一幅作品。他在生活中，他在人们的眼睛里——那些心灵的窗户中看到的就是灰色，他怎能不忠于生活呢？

他以农民的固执的爱，追求着自然的美。虽然这美也是带着灰调子的。

他对于社会，在当时所取的还是“羞涩的嫌避的态度”——亦即是回避之意吧，因为那时的艾青还是志在艺术而并非是志在改革。

然而，他对于贫苦的人们，却是怀着深切同情的，他甚至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连结在一起。那些车夫，那些小贩，那些划子上的船娘，那些可怜巴巴地永远也不缩回手的乞讨者，那些农民和他们的嗷嗷待哺的儿女，都是艾青画画的主要的形象来源。

画到了画册上，也刻进了心灵中。

自然，在当时，艾青并不是自觉地想要歌颂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他还是站在人道主义的同情的门槛上，朝着社会投去忧郁的、善良的目光。但，也恰恰因为这一点，却使艾青能以比较严密、谨慎的态度用画笔开始解剖这个社会，并由此开始，使他的创作生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便能渐渐地和他所热爱的人民连结在一起了。

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革命者。

他的目光里总是带着冷峻和疑问。

他注重面对现实。

他在少年时代就是不善辞令，甚至有点沉默寡言的。

他曾长久地徘徊于断桥桥头，在黑夜，远远地望着西子湖畔的各种窗户里透出来的光。仿佛在窥测、寻觅这世界和人生的另一个角落。……

他喜欢独来独住。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冬天的早晨，他又一次来到西子湖畔，没有雨具，任一根根冰凉的雨丝走进心里去。

他看见，寒风正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间穿过。他想起了夏日初到杭城时曾使自己赏心悦目的那些荷花。

夏天较之于冬天，有时，也是不堪回首的呀！

艾青站在西子湖畔的一个墙角里，落下了冰冷的眼泪。——不知道眼泪是为谁而洒落的？为这早来的冬？为这凋谢的花？抑或是想起了草棚中凄凉度日的大堰河？对了，那边的池塘里，也是有荷花的。但农民哪有心思赏花呢？他们是为了吃藕，为了填饱饥肠呀！……

西湖，残荷，你们可曾记得少年艾青之苦恼？

在学画的西湖国立艺术院，一方面艾青受到了比较严格的、系统的画画的训练；另一方面，却又不时地流露着他的更为显著的诗人的气质。

他的优郁、善感，他的忘情于清晨和黄昏的野景的冲动，他的在孤山下小树林中踽踽独行的寻觅，已经很像是一个愤世疾俗的诗人了！再加上他对画画的爱好的，她从学画得到的捕捉、描绘形象的技巧，以及各种线条的交织，各种色彩的对衬、渗透、组合，都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作了具有艾青自

己的鲜明特点的准备。但，在当时，即便是艾青自己也未必准备由画画而改行写诗的——虽然他正好将要去经历那充满着创造的艰难、机遇的巧合的文学艺术领域里所常见的一种现象；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在那时，他开始读屠格涅夫的作品，并且爱上了屠格涅夫。

在当时的中国，屠格涅夫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很少。但，就是这些数量不多的、刘半农在 1915 年翻译的几篇散文诗，却已经在文学青年中辗转流传了。

屠格涅夫的优美的文笔，清新的格调，以及诗一般的韵味，对于刚刚摆脱文言文不久的中国的文坛，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强烈的反响——艾青也陶醉了——陶醉在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的和平、宁静、美丽的景色之中——也陶醉在屠格涅夫笔下缠绵悱恻、芳香四溢的爱情的描写中。

他已经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了。但，对于爱情他却是陌生的。疏远的。

在西湖，艾青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那是一个苗条而秀气的侧影——可惜这个侧影还来不及留进他的画册便悄然消失了！

她的面庞呢？

她的眉毛呢？

她的眸子呢？

——一切都是不得而知。

艾青的心里怅然若失：爱情也是迷惘的呀！

有迷惘，便会有寻求，便会有渐渐的不迷惘。可怕的不是迷惘，而是自以为是的清醒和满足。

虽然一样是寻求，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经历和天性，因为不同的社会、家庭的影响，也因为不同的机遇，又会作出各种不同的选择。因而，在 1928 年到 1929 年这样的中国历史上各种新兴的力量、新兴的人物纷纷崛起的年头，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的时刻，艾青所选择的——他几乎是平静地选择的——仍然是艺术的道路。

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他自认为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同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并代表无产阶级以最有力、最动人的诗歌为革命歌唱、呐喊，却从不自己为自己打上无产阶级的标签是互为表里、前后一致的。

艾青要到法国留学去了。

艾青要到那个有着凯旋门，有着罗浮宫，有着巴黎公社社员墙的异国留学去了。

艾青自己也不知道此行究竟会有什么结果？他仿佛也只是为了冲出心灵的迷惘，作一次新的探求。

漫漫旅途中的大洋的风浪，或许会或多或少地冲去他心头的忧郁，而对于年轻的心灵来说，远方——越是非常遥远的远方，越有吸引人的魅力——虽然，这个远方因为远得根本看不见，或许本身也朦朦胧胧的。

艾青的校长林风眠先生对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的，到外国去吧。”

其时，林风眠先生已经看过艾青的几幅水彩画。他显然发现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才华，而同时，也感慨于中国践踏人才的漫长历史，才会对艾青作出这一番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一生道路的选择。

艾青好像是命里注定要过流浪生涯的。

奇怪的是，从他自己不愿意离开穷苦的大堰河起，他一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流浪，渴望着在流浪中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

开始时，他是流浪儿。

后来，他又成了流浪汉。

临近古稀的年龄时，他成了流浪的老人。

他从中国流浪到外国。

他从外国流浪回中国。

他从中国的北方流浪到天山脚下。

他是在流浪中认识真理的。

他是在流浪中成了诗人的。

每当他回忆自己一生的流浪生涯，总会想起在西湖求学时，和同学们一起躺在草地上，漫无边际地作流浪畅想的场面——流浪去，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啃一块硬面包，还有比自由自在更宝贵的吗？

1929年春，艾青去法国之前回了一趟金华老家。

艾青的回家与其说是向父母辞行，还不如说是为了骗取父母的钱以作路费之用。

艾青的父亲一听说艾青想远走法国，脸色便十分阴沉了。他终于明白这个一落地便被算命先生定为“克星”的儿子，是下决心要跟自已过不去，要离开自己越来越远的了。

早已剪过辫子的蒋忠樽，并没有因为辫子的消失而消失掉封建的一切。他兢兢业业地厮守着的祖传的田地和店铺，都希望传到艾青手里，哪怕不多，只要不败落下去就好。

可是，艾青却只给他带来失望。

在当时，信仰诚实的艾青因为知道父亲的内心，便也只好施展骗术了，说：我去法国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一定赚大钱回来。

艾青的父亲在将信将疑中，依旧板着脸，从东厢房的地板下小心翼翼地挖出一千块叮当作响的罗马光洋，用抖索的手一块一块地交给了艾青。

艾青有了到法国的旅费了。

艾青因为父亲的终于受骗上当而在心里暗暗高兴着——这个曾经痛打、辱骂过艾青多少次的专横的父亲，为着这一千块罗马光洋，不知道要心疼多久！

艾青，却是一身轻松了。

他没有什么留恋，也没有什么牵挂。

他现在所期冀着的，只是远涉重洋的那一条风波起伏的路，是地中海的风浪，是苏伊士运河的帆影，是巴黎的埃夫尔铁塔，是悲壮的马赛曲……

他的简单的行装之一，就是他的画夹。

他将为人们留下什么样的画幅呢？

他将给自己留下什么样的影子呢？

他又将以什么样的色彩去描绘将要迎向他的新的生活、新的岁月呢？

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地中海，站在艰难地行驶着的那只法国邮船的船头，他是在构思着一幅画呢？还是在构思着一首诗？

他想起屠格涅夫了吗？

他是深深地爱着这位俄国的诗人与作家的。

他轻声地吟诵过屠格涅夫的《爱之路》吗？——

“一切感情都可以导致爱慕，导致爱情，一切的感情：憎恶，冷漠，崇敬，友谊，畏惧，——甚至蔑视。的确，一切的感情，除了感谢以外。”

也许，艾青首先想到的还是屠格涅夫的另外一篇名著《门槛》——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呢？”

“——知道，——姑娘回答说。”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重的门闩。”太孤独的汽笛在太浩瀚的海面上鸣响着。

细小的，却是坚韧的。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寻求的不也正是那一条爱之路吗？在这一条路上，是有很多必须逾越而又十分无情的门槛的。就像这航船，停泊在港口时是高大的、雄伟的、平静的，可是一经投放在海里便显得渺小了，并且不时地在危险中颠簸着。每一个浪头都是一道门槛。

无数个浪头的连接便是一条爱之路。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从平静的西湖到沸腾的地中海，19岁的艾青第一次领略了风浪的多情与无情。

流浪者因为没有奢望而不会绝望。

流浪者面向着海洋！

第六章 跋涉者与中国的路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回忆，有时会交叉，有时也会重叠。

回忆，有时像山里寻路的小溪，漫无目的地流淌着，但，一定会有小草与落花相陪伴。

回忆，有时像长江的入海，绵延几千里，奔突几千里，终于欣然找到了归宿，长波阔浪，一如旗帜在飘舞……

回忆中的土地，回忆中的雪花……

回忆中的炮声，回忆中的烈火……

艾青出狱后回家小住了一个月，并与张竹茹订婚。后来，又经人介绍到常州女子师范教国文和图画。学生喜欢听他的课，幽默，风趣，并且自由、随便。上作文课时，他不出作文题，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艾青是爱美的。但，他又不主张太过分的打扮，便和学生们开玩笑：“你们烫头发，狮子头一样的，多难看啊！”

说完这句话的当天，艾青去理发。刮脸时他睡着了，理发师便自作主张给他吹了风。艾青醒来一看，真有点着急。第二天，他的学生们便开始开他的玩笑了：“艾先生也烫发了，狮子头一样的，多好看啊！”

艾青只好苦笑。

下半个学期，艾青便被解聘了，女校长怕他再传播革命思想，而且，只教了半年书的艾青在教员、学生中威信就已经很高了，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艾青在打破饭碗之后又到上海找到江丰，两个人在一个亭子间里卖文为生。同时，继续过着他的流浪者的生涯——这时候的流浪者艾青，已经不是“穿着草鞋，寻找温暖”的艾青了；他是在找一处阵地，找一处集合着战士的冲击出发地，他的流浪中的呼号，已经是和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浑然一体的了。

艾青是渴望着出版诗集的。虽然，当时他已因《大堰河——

我的保姆》而闻名，但，出版商却是不顾这些的——既无钱可赚，又要冒政治的风险——便纷纷退避三舍。

江丰是不服气的，这样的好诗一定要设法出版不可！其时，江丰的画已经有点名气了，在上海的熟人也多，他便八方奔走，东拼西凑。借到了一笔钱，又去联系出版社、印刷厂，自费出版了艾青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时间是1936年。

难啊！诗歌。

难啊！诗人。

从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在上海的那一个小小的亭子间里，艾青以诗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向着黑暗的社会冲击。

他挑战着。

他奋斗着。

他以诗人的机敏预感着，在预感之后呼号着。1937年的早春。

龙华的桃花开了——带着血的红色，一年一度地开了。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就义，艾青写了一首《春》：

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

在神话般的夜里
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
爆开了无数的蓓蕾
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
人问：春从何处来？
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坚信着春天一定会从墓窟里走来，从艾青的预言中不难看出，艾青的信念因为有了抗日火炬的点燃，因为有了理想的追求而变得博大。

写于同期的《煤的对话》，是献给他的好友李又然的。这一首诗的结尾两行是这样的：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火啊，艾青渴望的火！
火啊，艾青期待的火！
点燃愤怒的大火，燃亮当时的中国！

如果再没有火，这亡国的黑暗将会把华夏吞没；如果再不点燃火，中国又向何处去呢？而日本军的铁蹄声，却是越来越近了……历史，给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有人做了英雄，有人做了汉奸。
有人做了大胆的预言者。
有人做了彻底的昏睡虫。
艾青曾有过多重预感。

他把这种预感用来写诗，用诗的呼声告诉自己的人民。在这里，预感和灵感几乎是很难分开了。

但，艾青的心灵里是一个将要沦于灭亡的民族的全部，是要做一个大地的真正的儿子的愿望，那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才能感觉到——这种感觉几乎是带着传奇色彩的。

1937年7月6日，从上海去杭州的列车上，艾青望着飞快掠过车窗的土地，读着当天的报纸，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终究要复活的预感油然而生。

他在这飞奔的列车上，写下了新作《复活的土地》。
次日，“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预感成了现实——
……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枪炮怒吼了！
火光点燃了！
战斗中的希望，虽然还十分遥远，但毕竟是有望了。

对于民族的存亡，艾青此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在预言之后还问自己：“这时候，随之而起的是创作上的痛苦和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

时代驱使着艾青。
战斗呼唤着艾青。
艾青离开了上海的那一个小小的亭子间。
艾青到了武汉。

1937年的岁末，武汉已经被围在凛冽的寒风中了，日本侵略者也正向这儿迫近。

一方面，武汉的工人、市民、知识阶层在准备着武汉保卫战，在呼喊着不当亡国奴的叫人心惊胆裂的口号；另一方面，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商贾巨富，依然在逍遥作乐，而阔太太们则忙于整理细软，随时准备躲到更后的后方去。

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
客居武昌的艾青，又一次被一种预感的袭击而心神不宁了。
他预感到要下雪。
下雪以后将是冰封雪冻的日子。
冰雪中的路是要格外泥泞、格外艰难的。
走在这一路上的，是中国，是多灾多难的民族……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首百万人争诵的诗篇，便是在这样的寒冷的预感中诞生的。

艾青写道：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那从林间出现的，
赶着马车的
你中国的农夫
戴着皮帽
冒着大雪
你要到哪儿去呢？
……而我
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们的生命
一样的憔悴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
我们的年老的母亲，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异邦人
不知明天的车轮
要滚上怎样的路程……

——而且，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诗写完，艾青从昏暗的灯光下抬起头来时，窗外真的飘飘洒洒地落下了雪花。

艾青说：“这场雪是为我这首诗下的。”

这是一首忧郁的诗。

这是一首沉思的诗。

这是一首冰冷的诗。

这是一首与《复活的土地》格调不一样的诗。然而，在正视民族的灾难这一点上，两首诗都是一脉相承，都是从艾青的心灵里流出来的。

这是一首不知跋涉的泥泞与艰辛，便决然写不出的诗。

这是一首寓火热于冰冷中的，催人猛省，使人从悲凉中奋起，作哀兵必胜之举的诗。

这是一首有着哲人的预言的诗：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

为着这样深广的哲理与思考，为着这样的思考是建立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上的，读者在多少年以后重读这首诗的时候，仍然魄力不减，仍然博得满堂的掌声。

这或许是艾青始所未料的。

艾青的一生，有多少岁月也是在崎岖而泥泞的道路上走过的呢？

他没有退避。

他没有落荒。

他没有在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日子里，企图求得属于自己个人的名利与安逸。

他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条路，是崎岖而又泥泞的。他只是远见卓识地预言：这一条路，是崎岖而又泥泞的。也许，他从未想过要去做一个预言家的，他只是忠实于自己的预感、感受，决不愿意去欺骗自己、进而再会欺骗别人的。革命，时代，与人民，正在这样的路上跋涉、前进——艾青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前进中的一个跋涉者。冬去春来。

落在中国土地上的雪开始化了，而寒冷还远远没有离去；但，小草将要复苏，万物将要更生，种子将要萌动——崎岖而泥泞的路上，将会有探索者、吹号者、战斗者的脚印前仆后继地向前延伸，向着未来，向着太阳。

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热潮中，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保卫大武汉的金戈铁马声中，奔走在崎岖而又泥泞的道路上的艾青，完成了抒情长诗《向太阳》的写作。这是一首使武汉三镇热气腾腾的诗。

这是一首使抗敌将士热血澎湃的诗。

这是一首像风一样传播开来，在无数的爱国青年心中广为流传的诗。

诗人一如既往地以真诚的眼光，面对着现实；同时又以强烈的浪漫主义的气息，用印象派的手法，烘托起一轮温暖的、光明的、普照心灵与万物的太阳；而太阳下，则是无数从牢狱里、从草棚中、从社会最底层挣脱出来的，为着自由与和平、为着民族和儿女，无畏地进军的大队！

诗人写道：

太阳

它使我想起法兰西美利坚

的革命

想起博爱平等自由

想起德谟克拉西

想起《马赛曲》《国际歌》

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

诗人笔下，在这历史的巨幅画面的概括后，还有为抗战而募捐的少女，为抗战而流汗的工人、还有“比拿破仑的铜像更漂亮”的，为成争而负伤的伤兵。在向太阳的行列之中，正是由这些本来是唱着人类命运悲歌的人，组成了早晨一样新鲜、活泼的潮流。艾青在《昨天》这一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现在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这两行诗，这短短的两行诗，所包含的是多少深沉的感情；所概括的是何等久远的年代；所寄托的是何等丰厚的希望啊！

无论是在《向太阳》之前，或之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像艾青一样，以如此准确、简练的笔触，多层次地、立体地、在运动中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初升的太阳：

太阳

从远处的高层建筑

——那些水门汀与钢铁所砌

成的山

和那成百的烟突

成千的电线杆子

成万的屋顶

所构成的

密丛的森林里

出来了……

……在我最初对世界怀着热望

而航行于无边蓝色的海水

上的少年时代

我都曾看着美丽的日出

但此刻

在我所呼吸的城市

喷发着煤油的气息

、柏油的气息

混杂的气息的城市

敞开着金属的胴体

矿石的胴体

电火的胴体的城市

宽阔地

承受黎明的爱抚的城市
我看见日出
比所有的日出更美丽
毫无疑问，倘不是诗人的情感灌注到了太阳上，这太阳就不会有那么温暖；倘不是诗人的心灵与太阳相通，这太阳就不会那么迷人！
太阳！
人民！

未来！多么好啊，“我看见日出，比所有的日出更美丽。”这样的日出，此时此地的日出，使武汉三镇得以从早春的寒气中稍有暖意的日出，因为融汇着艾青的感情和想象，灌注着诗人对新生活的憧憬，而变得具体了，明晰了，绚丽了，丰满了！诗人的无法抑制的激情，凝成了下面这几行脍炙人口的诗句：

这时候
我时我所看见所听见
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
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
死去……

在抗日集会上，在前线和后方，这首诗辗转流行，被无数的人用各种纸张、各种字体、各种最原始的印刷术翻印。有大声地朗诵的。

有轻轻地默念的。
有悄悄地传送的。
赢得了欢呼。赢得了热泪。
战士看着它冲向前线。
学生看着它寻找战场。

心灵的艺术，在艾青所不认识的千千万万的心灵上响起了美好、动听、激扬的回声。

这首诗，无论对于艾青自己，还是对于抗战时期的文艺，都是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从那以后，迄今四十多年的历史中，爱艾青的、恨艾青的、理解艾青的、忌妒艾青的，都离不开这首诗，都在议论这首诗。然而，诗人是左右不了战局的。

武汉还是失守了。

再见，长江；再见，江汉关；再见，黄鹤楼；再见了，从此以后听不见了卖“热于面”的小贩粗嗓门的叫卖声……

艾青走了。

在长江的愤怒而悲壮的咆哮声中，在 1938 年的又一个茫茫的寒夜里，艾青走了。

他的脸上——瘦削的脸上是凄凉的微笑。每一次仓皇中的出走、奔波，都会使本来就十分敏感的艾青想起自己的流浪者的命运。不同的是：他在纵情地抒写，并在生活中确实成为向太阳的一员之后，他的忧郁变得深广了。他的爱憎属于大众了。他的脚步紧随着这苦斗的时代的希望的脉搏了！

明天，后天，难道还不会有太阳出来吗？

1939 年初，艾青到达桂林，经善草介绍，在《广西日报》编〈南方〉副刊。不久，官方容不下艾青这样的抗战诗人，便想方设法，用“广西妇女”，“广

西卫生”等栏目来挤副刊，艾青火了：“这副刊快成公共厕所了！”愤然辞职，自己写作。同远在香港的戴望舒远距离合作，编辑过新诗刊《顶点》。

1939年冬，艾青离开桂林，穿过一重又一重的大山，到位于西南山岳地的新宁县，在衡山乡师执教。短短的蛰居山野的几个月，艾青写了《旷野》、《山毛榉》、《兵车》、《愿春天早点来》等的寄托着艰苦求索、追寻太阳的短诗。

山乡宁静，旷野寂寥。

艾青在这里仿佛是为了整理一下思绪，也仿佛是长途跋涉后稍稍的休息。课余和假日，他又重新拿起画笔，在山野之中画画，或者捡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好像是有点闲情逸致了。

但，久而久之，这种宁静便成了可怕的重压艾青的心，是向着远方的呀！远方的呼唤，是大山也挡不住的。

他知道：真正清静的时光，只能是在一个新的世界诞生时才有。

1940年春，艾青离开了新宁。起道夫夷江西行，到邵阳后改乘长江轮，直奔重庆——当时的“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这时候的中国，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一方面又诱使蒋介石消极抵抗，积极反共。为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使更多的人从徘徊、观望中看到光明，投身战斗，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了。

于是，艾青的《火把》便应运而生。

在去重庆的路上。

湘西的一个小客栈里。

艾青遥望着黎明前的朦胧的黑暗，那铁的兽脊似的起伏的山梁，像是一支迤通不绝的队伍，摇晃着的树枝后来忽然变成了无数的火把，而群山和旷野，以及近处的小溪，远处的江河，乃至沉默着、忍受着的各种有名和无名的小草们，对于这火把、这火光仿佛也都是期待很久的了。

有一个火把点燃，便会有千万个火把相连接。

要比普罗米修斯更加伟大的窃火者啊，火把站到了一切准备着出发和献身的岗位上，漆黑的夜因此而有了生气和亮色……

艾青选择了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形象：火把！这是高举着的火把。

这是流动着的火把。

这是倔强的火把。

这是美丽的火把。

这是能够烧毁旧肚界的火把。

这是可以创造新中华的火把。

在这一首诗里，继《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深沉、《向太阳》的广阔之后，艾青再一次显示了自己捕捉形象的本领、想象力的奇特以及抒情的人才。

那些看似娓娓而谈的语言，都是在艾青的心灵里浸泡过，都是滴着感情的血液的，都会使捧读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

当我看见那火把的洪流摆荡的

时候

的确曾想起了一种东西

看见了一种东西

一种完全新的东西
我所陌生的东西……
……火把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愈来愈多了
火把已排成发光的队伍了
火把已流成红光的河流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这里来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的脸上了
你们的脸在火光里真美
你们的眼在火光里真亮
你们看我呀我一定也很美……
让我们跟着队伍走去
跟着队伍到那边去
到那火把出来的地方去
到那喷出火光的地方去
快些去快些去快去
去要一个火把……

诗人的想象与激情，实在是好比长江大河了！在这首诗里，潜在的旋律取代了外在的音韵；生活的内涵摆脱了文字的羁绊；活鲜的口语增添了亲切感、亲近感、时代感。

读过这首诗的人，都能得到一个火把。

记住了这首诗的人，他的心里就会有一个久不熄灭的火把。

火把，燃烧了多久？

四十二年后，在杭州西子湖畔。

一个闷热的初夏的夜晚，一千多文化工作者、诗歌爱好者聚集在一个礼堂里。

为了庆祝艾青五十年的创作历程，也为了纪念艾青的故乡之行，这里正在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

当一男一女两个业余朗诵演员轻声地朗诵《火把》的片断时，艾青的眼睛潮湿了，全场的掌声雷动了！

散场时，天气更加闷热。

但，那么多的青年人，在骑自行车离去时，发自内心地朗读着、议论着《火把》。

听听这样的声音吧：给你一个火把！给我一个人把！

谢谢你，艾青；谢谢你，火把！

在杭州大华饭店、举目可望西湖的一个餐厅里，“湖畔诗社”的创始人之一，八十高龄的老诗人汪静之和一些青年朋友曾设便宴为艾青接风。

席间，汪静之感慨万般地说：“不容易呵，你走的路！我们曾天真地以为人间的爱多起来时，天下自然会太平的，才写了那么多的爱情诗。”艾青笑了笑：“我也想过写爱情诗的，可惜没有写出来，爱总是好的。”

离开餐厅时，一对正在举行酒宴的新婚夫妇站了起来，那位长得很漂亮的新娘说：“艾老师，我们喜欢您的诗，想和您合影留念，可以吗？”

艾青笑笑说：“你们长得都很漂亮！”镁光灯的一闪之间，是一座诗的桥梁……

回到寓所，艾青一样是愉快的、兴奋的。

他说，《火把》这首诗，完全是靠想象写出来的。但，那又不是空想，因为燃烧的心灵，受难的祖国，都盼着这火把！

关于《火把》，有多少记忆，是与火把一样绚丽而炽热的。

朱自清先生说过：“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表现。”

光未然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亲自朗诵过这首诗。

艾青一到重庆，主编《中苏文化》的葛一虹当即要走了《火把》的原稿，并预支稿费 200 元。艾青一直忘不了这 200 元钱，否则刚到重庆时，他会饿肚子的。

后来，在延安，在全国解放后，多少人告诉他：“我看过你的《火把》。”

“我还留着油印的《火把》。”

“我找《火把》的时候，也一直在找你。”

艾青什么也不说，只是笑笑——一种坦然、欣慰、满意的笑。但，他的眼睛里是闪着光的，那心灵的窗户里所照射着的，不就是他自己曾经举起的火把吗？

这样的《火把》，是可以烛照长夜，永不熄灭的！——

让卑怯的灵魂

腐朽的灵魂

发抖在我们火把的前面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这样的诗情，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艾青的语言；是可以用得上一中国的一句古话的：惊天地，泣鬼神！

奋发的精神足以惊天地。

大胆的诗艺足以泣鬼神。

想一想吧！闭上眼睛：“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这形象，这壮观，这想象，在新文化运动的诗歌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艾青！火把！

火把！艾青！

第七章 黎明的通知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那火把的回忆，使他红光满面了——多么可爱的火把，多么珍贵的火把！它之所以可爱，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从艾青认识之日起，便一直举着它，视同为伴侣、挚友，荒风漠野都无法使它消灭的！

大地的奇妙还在于：当你举起它，不仅能看见前方高远的路，还可以在回首间，照亮了昨天，那流浪者的脚印……

《火把》的成功，使艾青名震山城。在同时期的众多诗人的佼佼者中，叫人心荡神怡的桂冠，无可争辩地属于艾青的了。

艾青成了瞩目的艾青。

读者瞩目他。

特务也瞩目他。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监视、迫害，艾青自然也在其列。

他一出门，身后就会跟着“尾巴。”

艾青还收到了由陈立夫，谷正纲，吴国祯署名的参加“国父纪念周”的请帖。同时接到的还有田汉。

田汉问艾青：“去不去？”

艾青说：“这里有阴谋，不能去。”

田汉说：“对，我们不去，沉默就是抗议！”

我们的党也在关心着艾青。

1940年末的某天，山城重庆还是冰封雪冻、朔风呼啸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由轿子抬着，沿着陡峭的山路，来到了北碚育才学校，由周恩来作演讲。

胡风兴冲冲地跑来通知艾青：“快！去听周恩来将军讲话。”

演讲会上，周恩来用他的浓重的苏北口音，一边打手势，一边如诉家常地纵谈着抗战形势，希望进步文化人士努力工作，为抗战服务。艾青是早闻周恩来大名的，关于他的风度？他的雄辩，他的胆识，他的平易近人，乃至他的酒量，都曾听过不少动人的传说，今天算是一睹风采了。

艾青实在没有想到，周恩来在讲话中突然提到了他，知道他靠稿费度日，生活艰难，还知道被特务跟踪。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在沉思间，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的。”

艾青一直铭记着周恩来的这几句话。

这是自己人说的话。

这是既有关注，又有期望的话。

流浪多年的艾青，在异邦做过小工，在上海坐过监狱的艾青，渴望着太阳与火把的艾青，在历尽劫波之后，终于因为周恩来的指点，而看见了一条并不十分遥远的走向光明之路。

“到延安去！”——艾青决心既下，那是决不回头的。1941年一月下旬，艾青的妻子韦葳先走一步，与另外几个八路军的家属一起，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直奔延安。

在红岩村亲自为她们送行的周恩来，穿着一件皮夹克，在飘飞的雪花中挥手道：“同志们，一路小心，我们很快会见面的！”飘泊中的一颗心，踏实而安定了。流浪着的夜行者的脚印，因为已分明看到了象征着光明与未来的火焰，而不需再在徘徊中愁苦了。

等待着去延安的日子里，艾青是平静的，心境里有很多的设想，眼前不时有淙淙地流淌着的延河水掠过……

早春二月。

残寒将去未去之际：

芳菲将归未归之日。

浓雾将散未散之时。

艾青起步走向新的历程。

一个旧时的学生来重庆看望艾青时，艾青从他那里弄到了一张“绥蒙自治区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并把一人改为三人，与画家张仃、作家罗锋一起，坐一辆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出发了。

行前，周恩来送给艾青 1000 元路费。

周恩来嘱咐艾青：“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给扣留了，就打电话给郭沫若。”

车到宝鸡，艾青一行三人住在画家陈执中家的阁楼上。这时，正在定鸡筹款，准备去延安的严辰、逯斐夫妇，一听说艾青来了，便当即去看望。见面后商定，五人同行，重新确定了各自乔装打扮的身份，身材瘦高、风度不凡的艾青算是长官——高级参谋——持有刻印讲究的名片。张仃在榆林住过，稍通那边的人情世故，由他穿着长统马靴开路，应付盘查。罗锋老练沉着，自告奋勇做艾青的勤务兵，剃了一个发亮的光头，穿一身褪色的军装。严辰是唯一戴眼镜的，模样也斯文，算是随行的文书副官之类。

惟有逯斐不好安排，商量再三后议决：因为她年轻，长得也漂亮，权充高级参谋艾青的“夫人”——为了更像“夫人”的身份，在她的箱子里放了一件新的羊皮夹克，和一双演戏时用的时髦的高跟鞋。

从宝鸡搭车，经咸阳到耀县时，已是黄昏了。

夜风寒冷，乌鸦成群地飞来飞去，在头顶上鼓噪，与城墙上国民党哨兵的吆喝声、叫骂声互为呼应。

轮到检查艾青一行人时，张仃多少带点傲慢地递过去名片与护照。军警的手电筒一会儿照照名片，一会儿照照艾青。又打开箱子搜了一通，逯斐的高跟鞋使他们确信：这几个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进了县城刚到旅店住下，又来了查房的军警，一把抢走护照，说是要给局长过目，便扬长而去。等了很久不见有人把护照送回来，罗锋到警察局上门冒险去了，厉声责问道：“看护照还要看一夜？我们长官发脾气了！”罗锋把“长官”两字的口气说得特别重。

查夜的军警正在打瞌睡。一看罗锋来头不小，便找到局长把护照取回了。

天蒙蒙亮，一辆小毛驴拉的轿窝子车拉着艾青他们，赶紧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从耀县往北，经过铜川，是一望无边的黄土。因为临近陕甘宁边区，一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盘查越来越紧了。

一个国民党士兵从艾青的西装里搜出了牙签，顿时如临大敌，上上下下，翻来复去看了半天：“这是干什么的？”

“牙签。”

“不对，“牙签是银的。”

“大城市里有木头的。”艾青一边回答，一边摆出一付不屑一顾的样子。

路遇的一个国民党军官，骑着马，带着马弁，使艾青他们吃惊不小——两拨子人马，一前一后的这么走着，哪一天不小心被看出破绽，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罗锋丢过去一支烟，和马弁搭讪上了。神聊片刻，情报到手：骑马的军官来头不小，是洛川警备区的牛司令，行伍出身，从刀背上滚过来的，因为是杂牌军，一直不受重用。

艾青决定到宜君以后，摆开场面请牛司令吃饭，一来可以掩人耳目。二来可以表示身份，总之是有益无害。自然，与这样的兵痞同桌共饮，也是要有一点胆量的。

牛司令欣然应邀，几杯酒下肚便骂开了蒋介石，如何小看杂牌军，如何专搞磨擦等等。艾青机智地接过话题：“老兄，你不怕砍脑壳？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呀！”

牛司令大笑而罢。

自此以后，宜君地方，军警特务，旅馆老板，无不对艾青一行刮目相看：“他们是和牛司令一起吃饭的。”

绕过洛川，陕甘宁边区在望了。

艾青的“高级参谋”早已做厌了，便下轿步行，大口地呼吸着从革命圣地飘来的清新的空气。再往北，在那连绵不断的山头上，能望见扛着红缨枪站岗的妇女和儿童，山梁上有“信天游”的歌声隐隐地传来……

张仃性急，唱起了“国际歌。”

逯斐在笑。

艾青目不转睛地望着山梁那边，眼睛里又一次溢满了泪水……

就这样，艾青一行富有传奇色彩的长途跋涉，经过了国民党四十七道关卡的盘查，终于安然无恙地到达了延安。

周恩来的电报早已经到了。当边境上向延安报告说“文化人艾青等五位同志到了”时，延安回电：“武装护送。”

那时的延安，就像是纳百川、容千流的长河大江。她以自己阔大的胸襟，积累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浪花、水珠，在平等、自由及共同理想的追求中，团结着，奋斗着！显示出生机勃勃、光明磊落的形象。

宝塔山上的宝塔是不亮的，但，它却是真正的宝塔。

奔流不绝的延水是浑浊的，但，它却是真正的源泉。

这里是清贫的，但，清贫得廉洁。

这里有来自生活中的笑声。

这里有心底里发出的歌声。

这一种笑声与歌声。艾青是很久、很久已经没有听见了的。

崭新的生活展现在艾青面前。

艾青有了两孔窑洞了——在兰家坪。大堰河的草棚是难忘的，自己家里的宅院是冰凉的，巴黎，葡萄牙人开的旅馆的那一间过道小屋是压抑的，上海法租界的牢房是阴森的……而延安的窑洞却是属于自己的。门口挂着一串红辣椒，窗上贴着几个纸窗花，流浪者艾青有了自己的家了，东奔西波，枵腹之忧的日子过去了！

这是真正的家呀！

到延安两天以后，张闻天、凯丰设宴招待艾青。席间，艾青谈到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张闻天总书记叹了口气、亲切地说：“家里的事回到家里谈，有什么不可以谈清楚的。”艾青参加了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并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

在一次参议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演。艾青清楚地记得，就在毛泽东讲到当前边区的任务时，用了十分简练、明确、果断的语言：“我们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呢？没有了！”

艾青想，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通晓事物的辩证法，能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会后，艾青见到毛主席时，说：“你真会讲话。”

毛主席说：“我讲话老出毛病，后来知道了，就抓住要点，其他地方就不要紧了。”

就在这一次的参议会上，艾青开始构思并写作了他来到延安以后的第一首颂歌：《毛泽东》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
哪儿就沸腾着掌声——

“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
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
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
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是政治家、诗人、军事指挥者，
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
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

“一切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1941年11月，艾青接任延安《诗刊》主编，并由腊板油印，改成马兰纸铅印。作为助手的严辰，还兼管跑印刷厂等杂事。艾青曾为《诗刊》写过一篇题为《祝》的文章，文中写道：“诗是民主精神的焕发，是人类理想的最高表现。诗的发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达的必然结果。”

“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需要着诗，新中国的创造需要着诗……”

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的阶段。延安也一样，为了度过难关，走向胜利，文艺界的整风就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展开了。

艾青收到了一封毛泽东亲笔写的信：

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

此致敬礼毛泽东。

艾青到了毛主席在杨家岭的住地，同去的还有肖军、罗烽。经过中央大礼堂，过一座小桥，桥下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清明明的泉水；再拾级而上，便是毛主席的窑洞了。

也是挂着一串红辣椒。

也是糊着几朵纸窗花。

没有森严的警卫，没有厉声的喝问。

毛主席正在伏案工作。

艾青首先表示了没有早来看望的歉意。

毛主席诙谐地摆摆手：“不，我是老子作风。”

接着毛主席谈了文艺问题，说，有个别人写的文章像是从日本人的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只能登在《良心话》上。

艾青向毛主席建议：“你最好给大家讲讲话。”

“我讲话有人听吗？”毛主席微笑地征询道。

“至少，我是会听的。”艾青说。

谈话间，毛主席请艾青喝茶。放茶杯的桌子因为地面不平而有一会儿摇晃晃晃。

艾青，正想出去捡点什么垫上时，毛主席已经很敏捷地走出了窑洞，一会儿手里握着一块小砖片，亲自垫上，小桌子稳稳当当了。

几天后，毛主席又托人送来了第二封信：

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

此致敬礼毛泽东。

这时，艾青正在写一篇文艺方面的论文，题为《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论文初稿写成后，立即送交了毛主席。但，艾青没有去收集反面的意见。

很快，毛主席给艾青写来了第三封亲笔信：

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

此致敬礼毛泽东。

在杨家岭住地，毛主席再次接见了艾青。主席对艾青的论文给予了肯定，并就其中的若干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之间的交谈是随便的。

他们是像朋友一样的。

多少年以后，艾青回忆起延安的这一切，仍然充满着深情的回顾和依恋。

艾青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修改了文章，发表在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艾青写道：“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但文艺并不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文艺和政治的高度的给合，表现在文艺作品的高度的真实性上。愈是具有高度真实性的文艺作品，愈是和一定时代的进步的政治方向一致。因为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就愈明显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现实。”

艾青还在文章中呼吁：“我们必须彻底清除宗派主义、拆毁那些堡垒，拆毁那些障碍物——请它们到大海里去！”

艾青还特别着重指出：为了表现“新时期的新的英雄——群众”，必须“提倡新颖，提倡创造，用新的思想、情感、感觉，去和新的事物、新的世界拥抱。”

言为心声。

艾青的一个战士的姿态，一个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歌声的心灵，是那
样地鲜明、透彻，并且具有远见，使后人在多少年以后重读，仍有金石之声。

文艺上的反反复复的论争，艾青似乎多少有了预见似的。而且他只是
实话实说。与此同时，为着适应变化了的生活，艾青也有了更多的思考。这
一切，与艾青到了延安后，第一次穿着八路军的土灰布军装，目睹着、经历
着、感受着无数新事物一样，都预示着一种新的、对于艾青来说是前所未
有的变化。

诗人是不会惧怕变化的。

他勇敢地生活在生活与时代的变化中，面对着新的潮流。他不怕沾湿衣
衫，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心灵也是湿漉漉的，能开出属于这个变化着的时
代的花朵来。

——艾青，就以这样的思想准备，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多么难忘的延安呀！

1942年的秋天到来了。大生产运动使这一块黄土高原遍地开花、遍地
结果。金色的小米，红色的枣子，还有山坡上、山路边盛开着的各种无名
的小花，都在以自己的色彩、自己的芳香告诉人们：延安，是一块美丽的
土地。

艾青虽说出身于农村，又有过大堰河这样的乳妈，但，自己挖土，自
己播种，自己收获，这样的劳动和喜悦，却只是在延安领略到的。

在日后的回忆中，他笑眯眯地说：“我搞了点小生产。”他住的窑洞
门前的菜地里，结满了大红的西红柿。还有茄子、包心菜、辣椒、玉米。
煮熟了的老玉米趁热吃，是格外香的。

艾青到底是诗人，在那样的战争年代里，也总会流露出一点文人的雅
兴：他自己栽种、培育的波斯菊，也不失时令地开放了，花朵是各种颜
色的，有紫、有红、有白，摇曳着，微笑着。

但，战争还是迫近了。延安时代的田园风光，是在大战的前夕赢得
的，也是为战争服务的。艾青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做陶渊明。他的心飞到
了与胡宗南刀枪相对的前方，他渴望着到战士中间去，在战壕里写颂扬
这些战士的诗，写战争的艰难与希望。自然，他也准备学着扔手榴弹。

艾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希望到前线去的愿望。

在一张雪白的信笺上，毛主席用铅笔给艾青写了回信：

艾青同志：来信收到，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
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
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状
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不知你意如何？顺致敬礼，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毛泽东

几天以后，毛主席登门来看艾青。

毛主席披着一件棉制服，一大把的棉花已经从破了的右袖的裂缝里露
出来。头上戴的是一顶旧时的红军的军帽。

毛主席进门时，艾青正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在逗着她玩儿。

毛主席俯下身，高兴地看着孩子。然后，询问艾青的生活情况。他还
是说服了艾青，先留在延安学点马列，然后再去前线。艾青留在中央党
校。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整风。

艾青还担任了党校秧歌队的副队长。队长是刘芝明，周而复、朱丹都
是

秧歌队的队员。

面对着全新的生活，习惯于踽踽独行、多愁善感的艾青，也许并不能完全适应；但，他决不回避，而是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作品与新的生活，与延安相适应。

1943年初，他到延安南区的吴家枣园体验生活，住在当时边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家里，并且用通俗的口语写成了长诗《吴满有》。

用这样的语言，写这样的题材，对艾青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解放日报》还曾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赞扬了艾青。对于这首长诗，艾青的记忆一直是很亲切的，虽然后来因为主人公吴满有出了问题，诗也没有能流传下来。

但，长诗是艾青的艺术实践之一，却是无疑的；而有的诗句至今仍在为人所传颂，如“皱纹里也充满阳光。”

1943年春，艾青与木刻家古元，合作社劳模刘建章一起，随着一个运盐的骆驼队，到三边“采风”，体验生活。

艾青是骑马前往的。

马，在当时的延安，就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

艾青并不精通马术。

三边一带，地形和敌情都复杂，有的地方还有国民党的武装特务活动，为此，有时还需要当地的武装力量掩护。他们经过一个叫宁条梁的地方时，走在前面的古元说：“快，有国民党军队！”三个人立即策马飞奔而去，只听见后边有喊声：“不要跑！”结果是越跑越快，一口气飞奔了九十里路。第二天才知道，那是自己的部队。

艾青在这一次奔马逃命以后的体会是：只要拉住缰绳，就不会摔下来。

在三边，艾青听见了很多活鲜的群众的口语，看见了不少清新、健康的民间艺术。

在盐池县火山坡一个牧民家里。

陕北老大妈请艾青吃了顿饭，还送给艾青八张剪纸。其中，“大山羊”、“荷花鲤鱼”、“老鼠偷西瓜”三张真是惟妙惟肖，有夸张，有想象，有人情味。

当地的同志告诉艾青：“我们这里的风一年只刮一次，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

三边的风也真大，对面站着都看不见人的。

但，在这风沙满地的穷乡僻壤，民间艺术的鲜花一样是根深叶茂的。

在定边，一位农村妇女当场为艾青剪了一幅“母羊与羊羔”的剪纸。母羊的嘴里衔着苜蓿，羊羔正用足力气在母羊的肚子上吃奶，神形兼备。艾青与古元都连连称道，赞叹不已！

在靖边，家家户户都贴窗花，都有剪窗花的能手。

艾青家家户户地进门观看，有好的，便拿出自己带的白纸和农民交换。

艾青惊讶于这古老而朴实的民间艺术，在农妇剪刀下的新的活力。

农民的艺术是和农民的心灵一样纯朴、善良的。看不出艰难时世中的悲怆，也没有士大夫阶层那种要不自命清高，要不颓废忧愁的情调。

艾青满载而归了——将从三边回到延安。

驼铃声中，他想起了什么？

他一定想起了波斯菊和他的小女儿。

他一定想起了剪纸，盐工的歌谣及诗。

剪纸的艺术形象，全都取材于生活，诗不亦是如此？

农妇的直觉的感受，是因为形象思维而升华的，诗不亦是如此？

在单纯中，集中而饱满地给人以感受力，诗不亦是如此？

在我们的泥土中，在我们的人民间，是有艺术和艺术家的！

又是一个陕北高原上秋高气爽的秋天。

艾青率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团，到南泥湾三五九旅慰问，演出。

在南泥湾，在生长着小米的田野里，艾青结识了笑声朗朗的王震将军。

这样一个相识的片刻，可惜没有为摄影家所留意。

然而，历史却记载了这一切。

从此后，山高路远，人生多难；但，这样一个大将军对这样一位大诗人的友谊及支持，却是佳话流传，堪称师表！

1944年，艾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艾青的诗的溪流，像延河水一样奔流着。

长诗《雪里钻》是对战马的礼赞，也是对出入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士的颂扬，记录下了诗人的变化、探索以及他对时局的关注。他以民族存亡为已任的情怀在诗篇中不断出现。在《我的父亲》里，诗人写道：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

一个神圣的信仰。

他准备着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献给那一个他所讴歌，他所期冀的《时代》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艾青再一次地显示了他的预感的天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因为他的心里跃动着人民的愿望，燃烧着理想的炬火，他充分地把握住了人民一定会胜利的真理；于是，他以他的热情、深沉的诗句，大胆地、科学地、响亮地预言着新的世界、新的黎明的到来。

在延安的窑洞里，在胡宗南的炮火日益临近之时，《黎明的通知》诞生了。

这是艾青在延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进步，随着解放战争进军的炮声，一起传遍了全国各地的。

对于艾青来说，这是一次最辉煌，最值得骄傲的预感——

……我已踏着露水而来

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痛的
人类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
城市和村庄
请他们来欢迎我——
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
……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新中国的黎明啊，你早！
歌唱黎明的诗人啊，你好！

第八章 命运之神绕了个圈

这是一座回忆的雕像——

他很少带着胜利者的笑容，但，这回是真的——面对着该笑的黎明、该笑的红旗、该笑的鸽子，怎么能不笑呢？

他没有一直笑下去。后来，笑容消失的时间远比他带着笑容的时间长的多；但，在又一次汽笛的长鸣声中，笑容却悄悄地回来了……

因为他不善于笑，所以他笑得真诚。

他是以一个胜利者的步伐进北京的，首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期间，他是“国旗、国徽图案评选组”的组长。

在为我们亿万人民所敬仰的国旗与国徽上，有着艾青的、远比别人早得多留下的深情的眼神。

艾青是喜欢散步的。

于是，在一个燕剪绿柳的春日的早晨，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身边是上班的喧闹的自行车的洪流，迈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艾青，看着身边的长得很美的少男和少女，他又怎能不发出自豪的微笑呢？

要知道，他原是个流浪者呀！

他曾被他的生身父母流放过。

他曾在异国的土地上寻觅过。

从上海，从武汉，从桂林，从湘西……从灯红酒绿的都市之夜，到重山叠岭的湘西客栈，他拖着流浪者的疲惫的步伐，寻找着太阳与火把……

他看见春姑娘的篮子了。

他听见黎明的通知了。

他以自己一颗飞翔着的、热恋着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心，发着激动的颤音，在每一道他熟悉与不熟悉的篱笆前，认识与不认识的窗户下，呼唤着：黎明，到了；迎接这新的黎明吧！——人们熟悉他的声音——艾青，那是文青的声音。

然而，较之于新的社会，艾青对旧社会要熟悉得多；较之于歌唱新的生活，艾青对旧时生活的揭露要深刻得多。

新鲜的感受并不能马上成为诗，要酝酿，要组合，要深化。

艾青看着这一切。

艾青思考着这一切。

1949年9月27日，在开国大典前三天，在听取了毛泽东主席于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讲话之后，他的心里鸣响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写了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诗：《国旗》——

美丽的旗

庄严的旗

革命的旗

团结的旗

四颗金星

朝向一颗大星

万众一心

朝向人民革命
我们爱五星红旗
像爱自己的心
没有了心
就没有了生命
我们守卫它
它是我们的尊严
我们跟随它
它引我们前进
革命的旗
团结的旗
旗到哪里
哪里就胜利

艾青在建国之初的作品，并不算多。有影响的、激动人心的如《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那样的作品并没有出现——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一个功成名就的诗人？或许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吧？

他有过苦恼吗？

他曾经满足过（哪怕是一瞬间）自己的成就及越来越高的声誉吗？

艾青的路是愈来愈艰难了！

这里听说的艰难，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预兆——生活上的，政治上的，创作上的——但，因为艾青毕竟是一个一生都在爱着诗歌、都在探索着的强者——所以，归根结蒂却是艾青之所以成为艾青，成为被历史再三证实了的中国的桂冠诗人的预兆。

1951年，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与苏联作家爱伦堡一起访华，艾青从而与他们相识。在与聂鲁达的交往中，艾青感到了诗人对于生活和斗争的激情，是何等的重要！而流亡中的聂鲁达与在流浪中成了诗人，成了革命者的艾青，在有些方面又是多么相仿：他们都是幽默而乐观的，他们都是直率而真诚的，他们都是很容易冲动的，他们都是极重视友情的。

艾青是这样描写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与战斗的兄弟”——巴勃罗回到了智利。你像春天的燕子，披着满身的阳光……

巴勃罗离开这个荒原已很久了。当魏地拉把智利出卖给华尔街的时候，魏地拉把你也出卖了，你开始逃亡……

巴勃罗，坚强而又纯朴，你的声音好像是从地层下面发出来的……使地面为之震动的声音……

谁能忘记聂鲁达的诗句：

给我和平，给我酒，
明天早晨我一早就动身。

四面八方，
春天在等着我。

——《欧洲的葡萄》

同样，艾青的诗也自有艾青的魅力：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无休止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爱这土地》

聂鲁达看着笑咪咪的艾青，说过一句传遍了全世界的名言：迷人的艾青。其时，聂鲁达还是流亡的聂鲁达——那是“污秽的、阴险的、愤怒的年头”——因此，聂鲁达的诗不能不是带着强烈的斗争性及爱祖国、爱人类的激情的：

如果你要派遣芝加哥的屠夫
去统治我们所爱的音乐和生活，
我们将从岩石中，空气中
冲出来
咬你，……

——《伐木者，醒来吧！》

而艾青，却是不久才结束了流浪、战争生涯的；但，在年轻的共和国里，他却是一个受到尊敬的、同样年轻而声名显赫的诗人了。也正因为如此，聂鲁达给艾青留下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因为聂鲁达的中文的“聂”字是三个耳字，爱伦堡戏称他为“三个耳朵的人”。

艾青问聂鲁达：“还有一只耳朵在哪儿呢？”

聂鲁达笑着，指指前额：“在这儿”。

稍等片刻后，聂鲁达又补充道：“我可以倾听未来。”

在北京，艾青曾以自己的名义，请聂鲁达吃过一餐饭。那是在一家私营的、整个席位只有三张桌子的“康乐”饭馆——这家饭店的经营者据说是皇家后裔，以汽锅鸡闻名。

聂鲁达吃得很高兴，认为这是在中国吃得最美好的一次宴会。

聂鲁达离去后，艾青曾感叹过：“就像家里少了个人。”而世界又被分割着、路途是那样遥远。艾青曾写道：“但是，总有一天，这种情况会改变，那时，太平洋上将可以自由航行，从西岸到东岸，应该像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一样方便。无论我竹的诗，我们的工作，我们为和平而进行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

而聂鲁达也曾这样写过：

真理普及于一切，
纯朴主宰着大地，
大家都有面包和葡萄酒。
跋涉者总是期冀着未来的，倘不，一个小小的水坑也会使他不能自拔的。
未来，是属于一切正真和善良的人的。
未来，是诗人心中的瑰宝。

1954年7月，艾青与萧三一起，应智利政府总议院之请，前往智利参加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

就在艾青还在旅途中的时候，聂鲁达急不可待地就在大洋彼岸，扯着嗓门大叫：“艾青”、“艾青”！

组诗《南美洲的旅行》，使期待中的、关心着艾青的读者得到了满足与安慰。

他的巧妙的构思又回来了。

他的奇特的想象又回来了。

他的寓深刻的思想于朴素和平凡中的技巧又回来了。

他似乎是又开始得心应手了——当他去感觉人类的苦难，并以自己的特点去抒写时，总是得心应手的。

他决不会去写那种大家都写得出的、出一次洋所带回来的风光观感。

他带给读者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痛苦的、却不得不唱歌的、抱着小主人的黑人姑娘：

一个是那样黑，

黑得像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白，

白得像棉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住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抒情长诗《大西洋》，更是艾青的力作，是艾青在当时的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投出的一颗炸弹，举起的一面旗帜。它的浩大的画面，它的深广的思考，它的机智的比喻，它的层出不穷的新鲜的形象和想象，会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想到《向太阳》，《火把》；想到《黎明的通知》。

人而狮身的谜解开了。此到，在读者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新的大西洋——浩渺的水波闪着金光，从那些海岸和岛屿，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它是如此柔和而又坚定，抒发出这时代最大的愿望；它随水波荡漾。飘得很远，一直到每一个有人迹的地方……

可是，在当时，“华盖运”已经在向艾青迫近。诗歌界没有诚实地对这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给予应有的评价。它好像是被埋没了——被人为地埋没了。

从智利回来不久，艾青又到了舟山前线的海军部队体验生活，并写出了流传至今，魅力不衰的叙事长诗《黑鳗》；但，没有写出一首海军生活的诗——这也是曾经被人指责过的。

其实，一个诗人对于写什么，是时常有打算、有计划的，也会受到时代与生活的种种制约，然而，很多原来打算的计划落空了，最后只能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写那些原来不曾想到要写的题材。

这是不应该算作错误的。

不是还有什么样的诗也写不出来的诗人吗？

在舟山，那里的人民现在还传颂着《黑鳗》的故事。《黑鳗》的模特儿，至今还被人记得，并且说：“这就是艾青写的《黑鳗》！”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都有自己的艺术特长，都有自己的一条道路——在艺术实践上。在这样的中国当代诗人中，也许艾青的个性是最

为鲜明的，因而受到的待遇也是最为不公的。

1956年2月，艾青开始受到批评。

在这之前，艾青与妻子韦茨感情破裂，艾青长期地为家庭及爱情苦恼着，耗费了不少于他来说应该是格外珍贵的时间和精力。1956年他与高瑛结婚。此后，高瑛陪伴着诗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最漫长的时光。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

艾青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任何攻击党的言论。他只是替丁玲说过话；他只是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发过牢骚；总而言之，他只是因为他是艾青。

艾青被责令检查。

艾青不知道检查写些什么，他也没有自己从此便是右派的思想准备——他实在不是右派，而是讴歌人民、讴歌理想、追求着真、善、美的诗人。

他并没有认真的准备检查，匆匆忙忙中把妻子高瑛在医院写的一张纸条夹在自己的检查材料中了，而打字的人竟然又把这些打印在一起，于是，检查稿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最近，我因为生孩子，不知道这个情况……

翻读检查稿的人哄堂大笑。哄堂大笑后的结果自然是更不妙——艾青开始意识到了。

艾青要求再检查一次——他多少有点诚惶诚恐了，但，有人坚决地回答说：“不用了！”“不用了”的严厉，后来就成了一顶右派帽子。

一连串的惩罚，都是“高效率”地宣布、完成的：12月被开除出党。

次年4月，撤销一切职务。

“迷人的艾青”顿时成了“害人的艾青”了！

“诗坛的泰斗”忽然间变得销声匿迹了！

笔者曾经几次写到过艾青的预感的天才。

然而，惟独对自己厄运的来临，他却是缺乏预感的。他总是那么天真。

他总是以为自己从不害人，别人又怎么会加害于自己呢？他算是与世无争的了，名利等等，一概淡泊，即使如此，也不得安宁。

他牵挂着的，他思虑着的，他观测着的，是人民的苦难，是民族的解放，是祖国与世界的未来；然后，由牵挂、由思想、由观测而成为苦苦的形象思维，成为预感，成为诗；再由他自己大声地、诚挚地、执着地献给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与人民。至于自己，他的信念始终如一：

何必隐瞒呢——

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

因此，他又是坦然的。

艾青没有找任何人去鸣冤叫屈，他忽然想到：我本来就是流浪者嘛！

自然，他想到了已经过去的动乱的年头。

他自己的诗。

他的“那怕脚踵淋着鲜血，我也不会停止前进”的剖白。

他所歌唱的《时代》。

他的乳妈，大堰河……

他的《向太阳》！

他的《火把》！

他的《黎明的通知》！

他的《大西洋》！

他还要写，他不能没有诗！

他对于厄运的来临是没有预感的，但，他有过很多死亡的威胁，而终于大难不死！

他在上海坐牢时，生着很重的肺病，受审时是扶着上法庭的。江丰的母亲在场，老太太说：“那个有病的年轻人硬极了！”

他在从武汉到桂林的途中，几乎天天都有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泻炸弹，随便找个地方一躲，居然没有被炸死。但，有一次他发现，一块很大的弹片就在身边。

他在重庆被特务不止一次地盯过梢，他照样走自己的路。

他在延安有一次策马飞奔时，电线刚好把帽子打飞了丈把远。假如电线拉得低一点，或者他的个儿再高一点，那么，那次便是杀头之灾了！

他坐飞机横渡大西洋时，飞机的螺旋桨突然不转了，后来又突然转起来了。他在智利访问时，他坐的小汽车还和对面开来的车撞过一回他笑嘻嘻地回忆着这一切。

我不怕死，死奈我何？

对了，还有他写过的那个小小的《吹号者》；

没有一个人曾看见他倒下去，

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

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

然而，他的手

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不知道其时艾青有没有想起过也是他自己写的这几行诗：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对于艾青来说，仿佛是命运之神绕了个圈……

第九章 他思念天山

用不着再回忆了，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

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一个中国的大诗人的复杂命运的变迁，是由三个字开始的：“不用了！”

也是由三个字结束的：“搞错了！”

好心人也许会想：倘若开始不要那么武断地、坚决地说“不用了”，也许就不会有二十一年的冤屈，就不会有后来的另外三个字：“搞错了”。

谁知道呢？

为着这漫长的历程，一个字就得付出七年的代价。

七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从早晨到黄昏……

艾青说：艰难的日子是一秒钟、一秒钟熬过来的。那么，七年是多少秒钟呢？

有谁尝到过一朝被毁，门庭冷落的世态炎凉吗？

艾青是深知个中三昧的。

但，一个将军，三五九旅的王震将军却伸出了手：“艾青同志，你是热爱社会主义的，你不是右派！”将军还劝告艾青，离开这个地方，到下面去，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写你的诗去。

1958年春天，艾青和高瑛一起坐车离京，前往北大荒。

艾青的流放生涯开始了。

仿佛是从天上到了地下，但，他是落落大方的——他明了自己。他也这样安慰自己：权当我生来就是这里的人！

到达密山的当天，在一片荒凉的大广场上，几千名转业军人正待命向荒原进军。

王震将军站在一辆大卡车上，大声地问战士们：“有一个大诗人，叫艾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来了，他要写诗歌颂你们，你们欢迎不欢迎？”

广场上，是一片“欢迎”的声音。

在将军的讲话里，在“欢迎”的声响里，艾青得到了慰藉，他的眼睛里又是湿漉漉的了。

生活，如同这大千世界，也真是无奇不有的。在北京，在由他亲自参加设计、评定的五星红旗飘拂下的北京，在写得出诗和写不出诗的文人的圈子里，他忽而成了一名罪人。

而对于他的倒霉及离去，惋惜者有之，高兴者也有之。

但，在北大荒，在绿色与荒凉并存的北大荒，在希望如同年轻的小树一样生长着的北大荒，在他生前曾经十分熟悉、后来多少有点陌生的战士的行列里，他得到的是真诚的、大声的“欢迎”！

因为这发自内心的“欢迎”，从此后，艾青的长达二十一年的生活，生命，便与这些战士、荒原、树木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青在完达山下的一个林场当副场长。

他为这个新生的林场捐了五千元钱，还亲自跑了一趟哈尔滨，买回电锯、照明灯。

他和工人们一起伐木、盖房子。

他参加制订了林场的远景规划图。

他又有了新的家了！

他又有了新的朋友了！

生活是清苦而单调的。

没有音乐。

没有歌声。

没有喧嚷的汽笛。

也没有孩子的哭声或笑声……

但，艾青是平静的——他并不留恋热闹的大都市。因为，这里没有忌妒，没有权谋，更没有勾心斗角。

仙是一个垦荒者！

他重新成了垦荒者了！

满眼都是绿色呀！

他进出在大森林中。

这绿色的世界是和谐的：大与小，高和矮，枝头的绿叶，和地上的落叶；还有各种野生的小草、小花、乃至蘑菇、猴头；在仙看来，都是相亲相爱着的。

那些猛兽呢？

他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几句话，意思是说宁可被凶猛的兽类吃了自己的血肉，也不给懒皮狗吃；因为这些凶兽站在山海一角，是一种可见的壮观。

那些沼泽呢？

那些表面上温柔的沼泽，还点缀着小黄花的微笑，其实是万万进不碍的，进去了那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森林里没有现存的路，所以要格外留心。……

在林场一年半的时间里，艾青写了两部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及《哈马通河上的朝霞》。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诗歌。

虽然，那是不准他与诗的年代。

1959年9月，艾青被王震同志接同北京，度过了国庆十周年，便奔赴新疆了。

在新疆，他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运输标兵苏长福》，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但，因为不能署艾青的名，所以这本书是没有署名的。

艾青一直珍爱着这本没有署名的书。

在艾青的住所里，一切都是因陋就简的。

他的书桌上也没有多少书，更没有摆设。

他只是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那一张合影照片，压在玻璃板下，天天可以看见的。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公布了为艾青等一批著名人士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

不久，《人民日报》转来了几百封读者来信，向艾青表示祝贺。

王震将军亲自用毛笔给艾青写了封信，信上说：“你是歌颂过巴黎公社的子孙，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艾青的逐渐苍老的眼睛里，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火花时，十年动乱开始了。艾青被强迫搬家，从师部住进了地窝子，变成了“大右派”。

天山，你的不老的身影，你的流泉和白雪，你的野草与灵芝，可曾记得

遥遥地、衷情地望着你们的一个诗人的眼睛？

石河子的地窝子，你还记得艾青吧！

那个地窝子，不妨说是石河子这一块戈壁绿洲上最黑暗、最潮湿的一角；是猪羊随时都会闯入的地方；是见不到阳光也很少有新鲜空气的地方，但，那里的一盏油灯却是最亮、最亮的。

过去的岁月无论当事人是怎样艰辛地品尝、挣扎、度日如年的，但，时间的不停止的脚步，把这一切都无声无息地留下了。据说，艾青当年住过的地窝子后来成了猪圈，也有新疆来的朋友说成了库房：总之，它是被另外一些别的什么代替了，遮盖了。

艾青对这些最辛酸的往事的回忆，也是很淡然的。他既不沉湎于过去的成绩和荣誉——那也是巨大而光彩的啊；也不深陷在屈辱与伤痕中——那是一般的人几乎不能忍受的啊！

自然，他都是清清楚楚地记得的，只是不愿意讲，这个农民一样朴实的老实人，说的始终是老实话：受苦受难的又何止是我一人呢？

因此，关于这一段无异于囚犯一样、升级为“大右派”的历史，他的回忆却也是像他的诗一样精练而集中的——他偶而提起的是两件事：每逢全连开会，遇到传达中央文件或某领导的重要讲话时，总会有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声音传来：“艾青滚出去”！艾青便提着小马扎出去了，头也不回，无所流连，苦楚，一切时苦楚只是埋在心底，让你看着不着。

另外就是扫厕所，每天早起清扫十几个厕所。戈壁滩上的冬天是寒冷的，四壁透风的厕所里，尿和屎都结成了冰。他的扫厕所的工具是钢钎和丁字镐。戴着厚厚的棉手套，他先用钢钎在一个个尿槽里把冰层凿开，然后再挥动丁字镐，把坑里的冰块捣碎，然后再排除出去。

他扫厕所时，厕所总是干干净净的。

他扫厕所用坏了不知多少双棉手套，而高瑛又不知道在多少个夜晚，将他的棉手套补了又补——仿佛是在修补这残缺的岁月，修补那破碎的心灵。

高瑛在说起这一段往事时，总是流着眼泪的。她的回忆要更加细腻一些，那是因为作为艾青的妻子，作为一个六口之家的主妇，在那用棒子面糊口的日子里，她的担子是沉重的，她所蒙受的冤屈和艾青是可以等量齐观的。所不同的只是：她多少还了解艾青这个倔强的人，她必须要给他以尽可能的照顾及安慰，她要让艾青及孩子们活下去——且不管将来如何！

她不会忘记在没有钱给艾青买烟的时候，帮艾青卷莫合烟的情景——艾青已经没有工资了，每月只给15元生活费；她也不会忘记把一点细粮、几个白馒头让艾青一个人吃而艾青又推给孩子们吃的场面；她更不会忘记，哪怕只有一个鸡蛋艾青也要平均地分配给四个孩子吃——其中有两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至于高瑛自己因为是大右派的老婆而被一个小学校长毒打的往事，她却没有提起过。那一次，亏得连队里的一个哑巴职工一把抱住了那位挥动老拳的校长，把他推了出去。真奇怪，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场合，是由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告诉那些会说、会唱、会笑、会装假的人，什么叫真、善、美……

人啊，人！艾青的最小的儿子丹丹，现在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英俊的小伙子了。他的出生地是在石河子，他生下之后五六岁的光景，艾青的师级干部的待遇取消了，他的童年是在地窝子里滚大的。其间，高瑛曾带着丹丹为了上访而到山东、北京住过些日子。回到石河子、将要进入地窝子的时候，丹

丹丹清楚地记得，艾青站在地窝子的门前向他招招手，说了声，“回来了。”然后，牵着丹丹的手走进了地窝子。世上哪一个父亲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带进天堂呢？但，艾青只能把他带进地窝子。

在丹丹的记忆中，父亲是沉默的，时常翻动着一本厚厚的词典——后来才知道是一本法文词典；几乎天天都要看的是《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划了数不清的很直、很直的杠杠，写了很多的眉批。丹丹直到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曾是个大诗人，只知道——隐约地知道从前大约做过不算太小的官，后来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奇怪的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离不开书。因此，他们住的地窝子里的油灯是最亮的。然而，再亮也是油灯，艾青的眼疾从此便种下了病根。那一本法文词典翻破了，艾青又细细地重新裱装好，裱装得几乎跟新的一样。

也许是生活太艰难而无聊吧？也许是为了从童年稚趣中追回一点安慰吧？艾青还用阿尔巴尼亚烟的硬纸烟盒折成了、剪成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山岭、房子，房子的门还是可以开动的。这样的手艺，使丹丹惊讶了，或者也竟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的一点少有的与童心相连接的乐趣之所在。

丹丹经常看见有人来通知艾青去参加批斗会，在一个批斗会之后，艾青还带回来一顶纸糊的乌纱帽，放在地窝子的一角，随时准备在另一次批斗会上用。艾青总是默默地出门，默默地回来。有一次，批斗升级了，要弄到营部去，艾青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正要走，押解的人却说不行：怎么能穿军装去接受批斗呢？假如事先有规定，准备好被批斗者的服装就好了：一时实在找不出可以表示灵魂已被触及或将被触及的“革命服”，押解者大方地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褂子——咱们换吧，你穿这个合适。

丹丹看见的还不止这些。

——他曾悄悄地从地窝子的窗户里——没有玻璃只有一层塑料布的窗户里，看见过游斗的场面——其中也有艾青——自己敲着一个破尿罐，蹒跚而行；还有几个小孩拿着竹竿去鞭打艾青。丹丹记住了这一切。在后来与这几个小孩玩耍、摔跤时，丹丹把他们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自豪——我为父亲报仇了！真不知道丹丹会记得那么多往事。

有时，艾青还牵着丹丹的手去散步——那总是在夜晚、趁浓重的夜色降临之后。在此时此刻，艾青才可以尽情地欣赏一下戈壁上空夜色——天是那么低，那么蓝；星是那么大，那么亮；没有一丝云彩，裸露着一切；倘是秋冬，则万籁俱寂；倘是夏日，则百虫齐鸣。艾青总是久久地、忘情地抬头看着天——在那样的岁月里，他是不能抬头的；只有在夜晚，在昏睡者的梦乡的边缘，他才能如此忘情地一览长空。

丹丹说：他好象在研究星座和气象。丹丹清楚地记得，艾青指给他一个“w”星座，可是丹丹怎么也没有找到——直到如今。

谁知道艾青为什么久久地望着夜空、望着星星？

他想起过西子浙里的残红吗？

他想起过去马赛途中的黎明吗？

他想起过桂林的雨后的夜晚吗？

他想起过延河里的星光月色吗？

他想起过天安门广场的玉兰花灯吗？

他想起过他亲自参加设计的飘扬在首都北京上空的五星红旗吗？……

在如流岁月中，这一切都是似梦非梦呀！

不知道他究竟想了些什么，也许他只是在和星星对话——

星星说：艾青，我认识你。

艾青说：星星，你真美！

丹丹这样一个天真的孩子，却没有过天真的童年，月底，家里断粮了，总是由他去端着脸盆向邻居借一点棒子面。

他挨过的耻笑和白眼，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倔強了。

他和两个哥哥一起，决心要为自己的父亲带来一点愉快，他们去捡别人剩下的羊头、羊骨，回家熬一锅汤，在那样的时候，地窝子会变得稍稍温暖一点。

他的大哥曾向别人讨得一只野兔。为着能使父亲吃到新鲜的、活杀的兔肉，他把野兔藏在胸口、裹在衣服里；回家后一看、野兔还是死了；但，仍有着他身上的热气。

他们一起抓过麻雀，一起从废弃的水井里抓过野鸽子。“红烧铁雀”——这是他们在石河子的地窝子里吃过的最美味的佳肴。

石河子，那原本也是诗的故乡啊！

艾青，这个被人为地打入地狱的诗人，已经没有了歌唱的权利，但，这丝毫也不会给那些剥夺者增添一点诗的才情和灵感》更不能说艾青就不是诗人了，艾青就不再有诗了。

孩子们经常去拾柴禾。有一种叫梭梭草的枝干，重得像铁，一烧便会冒油。艾青的感慨油然而生：“多好的一种柴！”

他想起过写诗吗？想有什么用，那是不准诗歌出生的年代！

艾青曾在连队管理过苗圃。他把那些小树剪得那么整齐，就像刚刚剪过、刚刚梳理过头发的姑娘一样，也像他整齐地抄写在稿笺上的诗行一样。

他时常为一些营造得很严密、很美观的鸟窝而惊叹：里边是一层不知从哪儿叼来的棉花，外边是编织起来的马尾草。有时是一窝鸟蛋，有时是小鸟张开小嘴等着它们的父母送食……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艾青总是凝目久视，然后悄悄地绕开，不去惊动小鸟们，也从不去毁了那些可怜的小生命的安身立命之地……

他是爱美的。但，他被邪恶围攻着。

他是创造美的。但，他经常生活在毁谤之中。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能改变他的美的向往，他更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复仇者。

“权当我生来就是这里的人吧！”——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他总是与世无争的。他的写诗只是出于偶然，后来一发而不可收了；他的天赋才情以及他后来的走上革命道路，而使自己融合在时代的洪流中，并得到了诗的盛誉，本来应该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光荣；但，却为一些同胞仇视着。他不知道刚进城时给他定的“文艺一级”是怎么回事，只是把工资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我有版税，够吃的，要这个干什么？”从那时开始，艾青便彻底地忘记了这个在别的人看来也许是特别重要的标志着自己身份的级别，以及由级别而严格地计算出来的月薪。他只是靠着凌晨三点钟起床，辛辛苦苦地写作换来的稿费过日子。直到1963年，他所存的稿费即将耗尽，才重新拿工资——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要工资的“右派”。

愿随便给人戴帽子的年代，给人写入“另册”的年代，有一些人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年代，真正地不再回来！石河子的地窝子，你还记得艾青吗？

艾青是记得这一切的，他深情地写道：怀念天山。当他远离天山、出国访问归来，在一万米的高空，他仔细地瞭望过天山的身影，看见了雪峰、初阳，以及如岁月一般的逝而去的群峰……

他在天山脚下生活了十六年。从 1988 年夏天开始，他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但，在没有人身自由的那些日子里，只要是晴天，他都要寻找天山的影子。他说：“在万里无云的日子，它就像浮在空气里似的，向我露出和善的微笑”。至今，他想得最多的是天山上的筑路人，以及他们之中死者的墓地——

“让我们过路的人采上一束野花向他们致敬吧！”1975 年春，为了治眼病，艾青在王震同志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

他默不作声地生活着。

他在孤独中打发光阴。

那个时候，就连祖同与革命的命运还不得而知，又何谈艾青自己呢？

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个中间人；他也从来就相信这样的格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北京人。

中国人。

还记得 1976 年的清明节吗？

那飘着蒙蒙细雨的清明节，那天空阴沉得象要痛哭似的清明节，那失去了周恩来总理以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在花圈与挽联前面。

在小小的悼诗前面。

在凶涌的人潮之中。

在断肠的哭声之中——

一个老人，一个被有的人深深地记住，被有的人轻轻地抹煞的老人，穿着臃肿的棉衣，流着凄苦的眼泪，站立着、站立着、久久地站立着……

《在浪尖上》，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构思的。秋天，艾青在北京，和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一起，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978 年 4 月 30 日，《文汇报》副刊上，第一次出现了艾青的名字，诗的题目是《红旗》——不知是作者有意呢？还是历史巧合？——艾青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诗的题目是：《国旗》。

二十一年，大海游鱼因为一个巨浪的冲击而成了化石。

但，艾青没有死；他的冤屈、眼泪、思恋、痛苦、怅惘、屈辱以及仍然深爱着这一面五星红旗、这一片祖国大地的赤子之心，却积聚成了一座终究爆发的大山——那是爱与恨交织着的大山，那是轰响着心灵哀曲的大山啊！

他还是火把！

他还是泰斗！

他依旧迷人！

诗人的诗，假若只是诗人自己孤芳自赏，或者只是在诗人的圈子里鼓掌叫好，那都是不可靠的，有待于历史来证实的。诗人的诗只有被不会诗的大众所接受、所称道、所不忘时，才是诗人可以骄傲的日子。

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和他的诗终究是回来了！

他是悄悄地回来的。

他先是蛰居在他妹妹的家里，一间小屋挤了四口人。

他后来住在史家胡同的一个大杂院中的小杂院里，和所有的邻里友好相处着。

他还不是一个北京居民的时候，买不到油，买不到肉，买不到豆制品，邻里们总是会不声不响地把副食供应本给高瑛：“你们买吧，给艾青先吃。我们人口多，有富裕的，别客气。”

艾青听见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说的最普通的话。

艾青记住了。

那是一个连厕所也没有的大杂院。

冬天，生了炉子也还是那么冷。

艾青说：“比地窝子好多了！”

高朋满座的时候——他家里又开始高朋满座了——吐出的香烟的雾，会飘来飘去，浓重得很。艾青微笑着听别人说的时候多，有时，自己也说。

就连日常的谈吐，他也总是幽默的，不枯燥。他还是同当年一样，喜欢挖苦人，喜欢当面挖苦人，有时甚至用的是刻薄的语言。

被他挖苦过的，一般都是朋友。他当面挖苦，背后说他的好话。

他想挖苦人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挖苦的语言和话题。有的人，他是不屑于去挖苦他的。

无论是做诗，还是做人，他都主张说真话。

真话，有时是很不好听的。

假话，有时是十分美丽的。

熟悉他的和不熟悉他的人都说：艾青还是艾青。

倘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寻找他呢？——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

“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艾青，不只是一个人，是一束绿色的火焰……”“我把你的诗集藏在米缸里。”

“我抄了一本你的诗选。”

“艾青，你的诗呢？我们期待着你的诗，你的迷人的歌唱！”对于艾青来说，生命已经重新开始。在汽笛的长鸣声中，他的灵感在远山近水中都成了诗的回声。

第十章 夏夜，雷雨之后的遐想

一个凉风徐来的夏夜。

白天，是接连不断的雷阵雨。雨后的斜阳中，艾青在街头散步。一切都赏心悦目——在他的多情的、笑眯眯的眼睛里，这被雨水冲洗过的马路、树叶，乃至路边一家医院的铁栏杆，都显得生机勃勃、新鲜活泼。这个夜晚，他有好几次提到夏雨及雨后的美感。

他说：太阳光在鲜嫩的叶子上跳动，就跟圣诞树一样！

他说：马路上还流着很深的水，过马路就像过一条小河似的。

他还说了很多，笔者却在欣喜与惊讶中忘记了不少。

他坐在沙发上，目光从打开的窗户里穿过，徘徊在青枝绿叶间。

音乐般的“沙沙声”仿佛是一片叶子对另一片叶子的呼唤。

仿佛是夜行者的吟哦。

仿佛是诗人的心，在和大地上的绿色接吻。那个时候，他和他的雕像，无论是神情还是态势，都是别无二致的。

是沉默，也是奔放。

是停滞，也是飞跃。

是心灵的驰骋。

是诗笔的神游……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

在想象和联想的两条神奇的轨道上，

在形象思维的飘荡的云絮中，

在无限延伸的各种线条的交点上，

在色彩的组合和映衬下……

有天光云影，丽日和风，

有风雨雷电，地动山摇……

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曲折多于坦途；艰难胜于顺利；痛苦高于幸福。

有爱的抚慰，也有恨的磨砺。

在热闹的都市，有过舒适的宅院。

在荒凉的边地，走过跋涉的小路。

失望过，但，从没有绝望。

冷漠过，但，从没有湮灭。

多么漫长的构思！

多么遥远的寻觅！

多么凝重的含蓄！

但，不管他走的路有多么艰难，也不管命运曾经怎样无情地捉弄、折磨过诗人；他没有倒下，他没有怀疑过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他的人生实践与诗的实践是始终如一的，如同他早在1939年写的《诗论》中的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

艾青所指的三个轮子是：真！善！美！

从来没有谁像艾青那样对真、善、美的概念引用得那么鲜明而又具体——

——“真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它给予我们对于未来的信赖。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

在这里，以及别的《诗论》的章节里，我们所看到的艾青，不仅有诗人的火花，而且有哲人的智慧。

他是十分重视形象思维和形象的——甚至视之为诗歌创作的根本之一。但，同时他又时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予以取舍。他的诗的语言的独到性，往往是因为包含着哲理的缘故。他在理论上的独到的见解，与在实践中的独到的创造。是互为依存、互为引证，互为补充的。

他之所以要比别的写诗的人高大，是因为：他是诗论家的艾青以及待人的艾青的重叠。

他一生都在探索。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他的诗的风格、形式、手法乃至题材的选择等等，均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作为诗的艺术的根本性的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真、善、美。如果说1939年末脱稿的《诗论》因为战争、离乱种种原因，还不可能使大量的读者很快读到，而建国以后，我们对诗的美学的研究、介绍也还是贫乏的话，那么在四十年之后的1979年，艾青写的一篇短文“诗人必须说真话”，却几乎是有口皆碑的了。

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

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

有人惊呼：“艾青仍然是艾青。”

有人奇怪：“艾青仍然是艾青。”

是的，按照生活的一般规律，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东北的冰雪，西北的风沙，应该把它磨练得圆滑一点了，应该学会几句“今天天气很好，哈哈”之类的应酬与客套了，但，他实在没有学会，没有什么“长进”。

依旧是那样执着。

依旧是那样真诚。

依旧是那样天真。

也是早在1939年，他的《诗论》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不要把混沌与朦胧指为含蓄；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藏，是子弹在枪膛里的沉默。”

在当今诗坛上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中，他本可以什么也不讲的，谁也不得罪，稳坐着“诗坛泰斗”的交椅，对谁都笑嘻嘻。但，那不是艾青，他讲了，其实只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他的观点，略加引伸就是了。

有几个人咒骂他，希望他早一点进火葬场。这些话印在一个油印的刊物上，寄到北京的一个大刊物，大刊物的人再转交给艾青。可是，他依然花很多的时间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诗歌爱好者，看他的诗，听他们谈各种有趣的问题。

他说：“对青年诗作者的希望，很大！这就是写出好诗来，各人按各人的兴趣写，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听从这样写那样写的指令，思想解放

一点，不要怕这怕那。怕什么？怕忽然飞来横祸。当然一点不怕也是假的，不怕也是怕，怕一点，不要怕得太厉害。”

他是把自己放在青年朋友中间的，他总认为诗人与诗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他说过：“都是各自一家，我只是千家万家中的一家。”

外国的诗，以及外国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现代派，意识流等等，艾青都是并不陌生的，一点也欺瞒不了他，也吓唬不了他。

艾青自己恰恰也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是在学诗之初便大量地吸取了外国诗、外国文学艺术的营养，从而走上自己的创作道路的。自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的最根本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自己是个在中国写诗为着人民而奔走呼号的诗人！

艾青又是极为重视诗人的个性的人，他说过：“有你自己特点的诗就是好诗。”他对平庸之作的鄙视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朦胧诗的指责的范围是小而又小的：“那些实在叫人看不懂的诗。”他对多变的理论象‘崛起论’的鼓吹者，批评要尖利得多“‘崛起论’者，借‘崛起论’崛起了自己。”

他是从雷雨中走过来的。

那是怎洋的自然和人生的雷雨啊！

他在雷雨中的跋涉之路，是一根如此漫长的曲线……

有时，他好像是真的孤立无援了，乃至绝望了；只有雷雨，无边无际的雷雨。

有时，他在力图寻找星星的时候，星星不见了；只有雷雨，无边无际的雷雨。

这是谁说的？哦，对了，是艾青同时代的一个女诗人、石评梅说过：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慧星之迅忽。那么，这无边无际的雷雨，也是生命的一种启迪。

不是吗？在天山脚下的大戈壁上，在白天做“大右派”，被“专政”而剥夺自由后，晚上，有时也是而后，他站在大地上举目望去，天山的影子已经看不见了，天上的星星却是合情脉脉的……

他在雷雨之后的回首，是充满了神驰遇想的——

东北大森林里的“猴头”滴着露水，新疆戈壁滩上的梭梭草会闪出亮光，地底下不知又有什么精灵、矿藏在孕育中。还有鱼化石……

他不喜欢打伞。

他觉得小雨滴落在身上是一种很亲近的表示。

一切的艰难险阻，如海里激浪、天上的雷雨，当它们向你卷来时，落荒而去是不行的，只有面对着——艾青是笑咪咪地面对着的。

这果然是因为他是大堰河的儿子，从小为一个勤朴、善良的农妇所哺育；却也是他的生活的实录，几乎总是风风雨雨，干脆懒得打伞了！

但，他是为伞写过诗的。

他希望伞是这样的——

雨天，不让大家衣服淋湿，

晴天，我是大家头上的云。

雨后，一切都是新鲜而纯净得多的。

仿佛就连人的思想也经过了过滤似的。

站在北纬饭店他寓居的二楼一扇启开的窗户前，他说：窗户是很美的。

真的，大自然在一扇扇窗户里变得具体了，望得见天上的星星，以及远

处的光的流动。望着窗下拥挤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的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灰色的围墙，艾青的感慨是凝练而深沉的：我们还是太穷啊！

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高的和低的房子；各种各样的窗户和窗帘；各有欢乐；各有忧愁……

在夜晚，生活将会变得宁静，色彩也似乎少了，夜幕将要融化掉一些白天里的喧嚣及缤纷。

平静可见心境。

单调反而真实。

就连低垂的星空，也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于是，望星空，便成了地上的自古以来多少诗人吟唱的主题！艾青说过：给一切以性格，给一切以生命。

请看艾青笔下的月光：

前天晚上

我在北京的院子里看见月亮

笑眯眯，默不作声

今天早上

我在汉堡又看见月亮

在窗外，笑眯眯，默不作声

不知道她是怎么来的

她却瘦了

也是个夜晚……

艾青在参加 1980 年 3 月下旬于美国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后，回到了祖国。

笔者曾经去采访过——是用对话的形式聊天——艾青对于几个月的异国生活、长途旅行是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印象的。有的是故友重逢，而时代竟已全非往昔；有的是旧情重叙，因为真挚而久久难忘；也有的是回忆中的一片红枫叶，秋天是随着它飘来的这一席对话记录如下：

问：当你远渡重洋，回到祖国以后，你觉得你对这一次美国之行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是友谊。是一群热情的侨胞。是美国的友好人士。

在爱荷华，聂华苓一家把我们当作家里人，每天都要打电话问问我的身体情况，有些什么不适应的。还有不少旅美的华侨、作家、诗人，我们到哪儿，都由他们热情迎送与接待，是非常感动人的。

在波士顿，我们去看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他的记性真好，提起了一件我已经忘记了的事。1946 年，费正清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工作，他曾去过解放了的张家口，到华北联合大学访问我们。这次一见面他就说：“你当时对我说，希望美国给我们送来惠特曼，不要送来马歇尔！”他的夫人还请我们吃了自制的点心。

罗伯特·佩恩是美国的翻译家，翻译过我的诗。1946 年也去张家口看过我。当时，在交谈中，我说过喜欢德国的木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罗伯特·佩恩一直记着我这句话，这一次在纽约，他为我们举行很大的招待会。他事先准备了一本珂勒惠支的作品选集，一见面就送给我了。而且题了几句话。

在马里兰，国际交流总署的安娜女士把我们请到她家里，点上蜡烛举行宴会。她和她的亲戚都穿了晚礼服接待我们，那几天正是美国竞选总统很激烈的时候，安娜女士在席间对我说：“不管将来谁是美国总统，中美两国人

民的友好往来是一定要发展下去的”。这样的话是令人难忘的。

想起爱荷华的红叶也是很美的，到处都是。我在许多红叶村下照了相。但是，友谊的树是常青的。

问：在一次你和别的同志的谈话中，谈到在美国见到过的一些抽象派的画与雕塑，希望你稍微详细一点地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所见、所想。

答：见到了一些，但，不是全面的。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美术馆，中间都有陈列现代作品的房间。

抽象派的绘画和雕塑随处可见。我们在爱荷华一家戏院门前的草坪上，看到一堆砌房子用的预制块。我以为是一个公共厕所，有人说可能是要修房子，聂华苓的大女儿告诉我们：“这是雕塑——抽象派的雕塑。”

这在欧洲也见过。一个很大的广场上，一个很高的教堂前面，竖了一根二、三丈高的木头，纵断面锯开，没有锯完，顶端锯开约十厘米宽。有人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开玩笑说：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也是雕塑。

也有一个红的方块，加上一个黄的方块，就算绘画，挂在客厅里；如果这些都是艺术的话，什么都是艺术了。

抽象派的最典型的理论是：你自己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问：你能谈谈《香港》这首诗的构思和写作经过吗？

答：我开始写这首诗时，是完全否定香港的。后来，打出清样，送给我看，报社的同志提了意见，认为香港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我作了修改，把骂香港的有些句子删掉了，如“海盗的私生子”之类，加了最后一段。这就比较全面了。可见，写了诗以后多请几个人看看，是有好处的。发表前意见比发表后打棍子要好。

当然，香港究竟是殖民地，它的繁荣是恶性的、畸形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这儿竞争，喧嚣得很，嘈杂得很，资本主义的坏东西都集中到那里了。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大家都不会忘记历史。

过去说“吃在广州”，其实，现在应是“吃在香港”。香港有很多好吃的，我也吃了。但不能因为吃得好就说香港什么都好。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新诗现状，是感到高兴，还是担忧？你以为新诗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既不高兴，也不担忧。

高兴是因为非常好，担忧是因为非常坏。现在新诗的现状既不是非常好，也不是非常坏。

新诗还是在前进的。有不少新人出现了，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更不能和“四人帮”的时候相比。但，也只是开始，从“四人帮”垮台，还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嘛。

新诗的销路不好，同出版、发行有关。他们有成见，认为新诗比不上《七侠五义》，比不上张恨水的小说，有什么办法？看诗的人还是有的，我的《诗论》前后出了八个版本，现在还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据说去年再版时只印了一万多册。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这本书，说一个研究我的诗的外国人想要，我说我的书都送光了。

我一贯主张，诗要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思想感情，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学会了形象思维，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比较精炼的语言去写，道路是无比广阔的。

最广大的读者总是希望诗歌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把反映现实的涛加

以排斥，大家都写起“朦胧诗”，这怎么行呢？

问：你是怎样在表现自我和表现人民之间，努力取得其一致性的？你认为能够一致起来吗？倘是可能的话，又怎样才能一致起来呢？

答：可以，也应该写自我，但，一定要通向人民。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写过：“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在《我爱这土地》的诗里，我也写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写过很多表现自我的诗，但，又不仅仅是写我，我同时写“寒冷封锁着中国”，也写了“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等等。

还有一些诗并不是直接写“我”——但，融进了我的经历，我的经验，我的情感。比如《光的赞歌》，《古罗马大斗技场》等等。用诗的语言形象地表述了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真理。

诗人离开了人民，就像鱼离开了江河大海一样。

问：关于某些看不懂的“朦胧诗”，你过去发表过一些意见，你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

答：“朦胧诗”中，有一些不是太坏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发表。什么是太坏的呢？——我指的是那些没有内容、做文字游戏的、猜谜语连谜底也没有的怪诗。不要把怪胎、废物与畸形当作是美好的东西。

编辑自己实在看不懂的诗，就可以不发表。

“朦胧诗”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些评论家。本来，作为一种风格的朦胧是可以存在的；但，调子越唱越高，不是引导，而是一味吹捧，对年轻人毫无好处，只有造成混乱、骄傲自大与目空一切。其实，后来真正“崛起”的是那些评论家。

一首成功的诗总得有形象，给人以美感。

离开了形象思维就无法谈诗。

问：请你谈谈诗风和时代精神的关系。

答：总的来说，是时代影响诗风，而不是诗风影响时代。诗人是随着时代去感受、去思考、去反映的。

慷慨激昂的时代，靡靡之音就不容易抬头：和平的时代就会有比较纤丽的诗风出现。

我所坚持的诗风还是八个字：朴素、明朗，单纯，集中。但，我并不一概地反对朦胧诗。

问：你在香港说过，在抗战时期，在追求人民解放的月子里，你的诗要写得好一些，在和平时期相对而言要弱一些，这是为什么？

答：矛盾越尖锐，写得越多、越深沉。反之，就会显得平稳，就很难写。经过了“文化革命”这些年，经受了磨炼，现在我写得又比较多了。

问：请你对青年诗人，对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看谈谈你的希望。

答：为人民多写诗，而且要努力写得好一些——即使为自己写也一样。

要让人看得懂，读得下去，能感动人。

要深刻地理解生活，无非是洞察生活中的矛盾，表现这个矛盾——歌颂也好，暴露也好，都是为了把生活推向前进。

诗人要突破自己，首先要从构思上突破。

写诗不仅需要饱满的感情，还需要智慧——也可说机智、敏感。要善于寻找最鲜明的形象，寻找最恰当的比喻，最好的想象。我最近读了黄永玉的

几首诗，觉得很好，有构思上的突破，语言也巧妙。比如：“比苍蝇还不卫生”，就很新鲜。再比如：“他是动物，却跟植物一样沉默”，很深沉。

探索和追求都是好的，对青年诗人来说尤其重要。

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还在苦苦地探索。

关键并不在于用什么手法，而在于怎么去写。我那首 1932 年写的《芦笛》是用象征派手法写的，但，我写了：“谁不应该朝向那白里安和俾士麦的版图，吐出轻蔑的唾液呢！”——这就写了现实，写了革命。

我愿年轻人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收获！

当笔者告别艾青的时候，已是深夜。虽然觉得还有很多问题要谈，却不忍再留下去了一再过三、四个小时，艾青就要开始每天照例的写作——他是习惯于早晨三时左右起床，一直工作到早晨八、九点钟的。他常说，这个时候头脑最清醒，思路也明快，就像草叶上的露水。他常说：“我还有几个早晨可以努力的！”

第十一章 归来的歌

艾青和高瑛都无法说清楚，他们收到了多少来自工厂、来自农村、来自边疆，来自艾青流浪过的、流放过的地方的热情洋溢的信。这些信，都是真诚的祝愿；这些信，都希望能归来的艾青不再离去。高瑛总是认真地阅读这些信，有的还亲自作复。

还有远涉重洋，来自国外的——

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说：“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

法国的一个家庭妇女梅尼也喜爱诗，也是艾青的读者，她有着精辟的见解：“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一样令人生情。”

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说：“艾青的诗，好在那雄浑的力量，直截了当的语言，强烈鲜明的意象——可以看见、闻到、触到的意象，这也许因为他不仅是个诗人，也是个画家吧。艾青是一个有时代感、历史感、使命感，同时又有艺术感的诗人。”

美国的罗伯特·C·弗兰德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艾青孜孜以求的只有一点：希望他的诗能够给中国——和世界上一切无辜的受害者和被剥夺的人们‘些许的温暖’、更为坚毅的决心和勇气。当革命开始带来光明的远景时，艾青希望他的诗能激励人民去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

1979年5月，艾青出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五月末的一个晚上，在慕尼黑，与德中友协的朋友们见面。一位德国朋友站起来，要求艾青为他们朗诵一首诗。在热烈的掌声中，艾青朗诵了他的刚刚在德国写完的新作：《墙》——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听众中的一位中年妇女站起来，说：“听了艾青的诗，心里不能平静。另一个国家的人，如果不是真诚的朋友，怎么能够这样深刻地理解另一个民族的心头的苦闷？”

在她讲完后，整个会场一片寂静——艾青成了大家深思的对象——因为他的奇特的诗，因为他的真挚的超越了国界及各种障碍的感情。

1980年夏天，艾青到法国参加“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第四天上午，讨论的主题是：“向艾青致敬！”

对于法国，艾青是旧地重游了。

他在发言中说到，他来法国是学画画的。后来却成了诗人，这叫母鸡下了鸭蛋。“总而言之，还是蛋，只要不是坏蛋。”喜欢幽默的法国朋友，被艾青的幽默感染，高兴地笑了起来。1980年初秋，艾青又风尘仆仆前往美国“国际写作计划”进行四个月的写作与访问。

在他寓居的北纬饭店里，有一个美籍华人音乐博士叫刘邦瑞的也知道了，这里住着艾青。

这位爱诗的女同胞，过了几天后，把一首为艾青写的诗送给了艾青——笔者有幸读到，认为是一首好诗。诗的题目是《北京的雪》：

我看见北京的第一场雪——
我品味它的沉默、颜色。
片片和星星的
毛茸茸的光彩世界，还有我，
置身在广漠大野中，
说不出话来，因为惊奇和欢乐……
如果我的笔能起舞成诗，
你就会听到我心里的歌。

艾青以及艾青的诗歌、诗论，再一次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尊敬和荣誉。

《归来的歌》中也有凄楚情深的。

作为世界诗坛所熟知的艾青，人们很自然地将他的名字与一代名流希克梅特、聂鲁达联系在一起，也会想到、看到他所受的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影响，以及他从法国文学、绘画等艺术精华中汲取的营养。

然而，还有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丹娜——捷克的汉学家——毕生传播中国文化、毕生热爱艾青、盼望着艾青重新执笔的艾青的友人，中国的友人。

在艾青重新执笔写作后的大量作品中，有气势、深度堪与抗战时期的“火

把”、“向太阳”比美的长诗，如“古罗马大斗技扬”，“光的赞歌”等；也有一些描绘红豆、贝壳的精细含蓄的小诗，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另外一首《致亡友丹娜之灵》。

在这首 74 行的诗的前面是一行短的题记——谨以哀诗一首呈献于布拉格奥尔桑一号公墓九区三十八号丹娜的骨灰盒前。

紧接着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动乱不安的年代，
友谊象阴天的芦苇，
在风中哆嗦着，
发出听不见的哀叹……

五十年代初期，捷克汉学家、诗人丹娜·施觉维契科娃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北京大学讲学。飞机从明丽的白云中穿过，很快就要降落在北京的机场上。她一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是已经解放了的开着鲜花的土地——就想起了一首诗。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她在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刚刚翻译好，译作的题目是《手推车》，她在猜测着诗人的模样，她期待着对诗人的更多的了解……

她的期望是现实而又富于成果的。丹娜在中国结识了一批朋友，其中就有她在万里之外的祖国便敬仰着的艾青。她在教学之余翻译了鲁迅、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也翻译着艾青的作品，她成了传播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位辛勤的耕耘者。她回布拉格探亲的时候，艾青正好去智利访问，路经她的祖国。艾青和丹娜的会见是极为亲切友好的。在丹娜的完全是中国式的书房里，陈列着精装、线装、平装的许多中国书籍。她对珍藏着的《鲁迅全集》格外自豪，她让艾青看了由她翻译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别的译著。随后，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小餐馆里，丹娜设便宴招待艾青。1957 年底，丹娜聘期已满，要回国了，从此后，是真正的山高路远啊，什么时候才能重回中国，重新看到中国的朋友呢？她在机场上与朋友们一一道别。她从不算太多的人群中授寻着一个人，她找不到艾青了，她在焦躁不安的预感中询问着，她知道了：此时的艾青已非往日了一——人生、世事怎么会变幻得如此无情、而又如此使人痛苦与迷惘呢？

在漫长的回国旅途中，在青天白云之间，她的思绪久久地牵挂在中国的土地上。

丹娜仍然认为艾青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她是从艾青的诗中丢发见艾青的心的，并且相信自己的眼力。她给艾青写信，她希望知道艾青在命运的驱使下，过着怎样的生活？是不是还在写诗？仅此一点，丹娜较之于深通人情世故的一些中国人，也许是因为真诚而显得更加可爱的。

艾青在诗里写道：

我在甩袖无边的大荒原，
收到来自布拉格的明信片，
我褥蹉很久没有给你回信——
不相信蒲公英会飘到你身边。

生活，无一例外都要成为往事；有一些往事将要被岁月的沙尘埋没；而另外一些往事，则会袒露在回眸的视野之中。艾青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的：

当艾青在自己深爱着的祖国的大地上，在年长的、年轻的同胞中间，遭受着流放之苦时，身在异国的丹娜尽管没有看到来自遥远的天山脚下的蒲公

英，连艾青的音信也一无所知，但，她仍然在为艾青默默地尽她所能地伸张着正义和良知，翻译着艾青的二些名作，如《船夫和船》、《笑》、《公路》、《冬天的池沼》、《旷野》等。这些作品再由捷克文转译出去，传遍了整个欧洲。

一方面在抹煞。一方面在流传。

丹娜思念着艾青，思念着中国。在布拉格，每逢每年的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的那一天，她都要来到中国驻捷克使馆，默默地在来宾留言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她没有写过任何对中国不友好的文字——在那不平常的年代里——在她的一生中。

1976年10月30日，维尔塔发河涛声隐约，布拉格市内大雾弥漫，丹娜驾车前往市区，一个庞然大物吼叫着向她冲来——她死在布拉格的雾中。

这个时间，正是文青渐渐地看到一点生命的新的亮光的时候。后来，当艾青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仍可写诗的艾青，而渴望着想知道丹娜的近况时，丹娜却已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带着她对对中国、对艾青的深深的眷恋——她在遭车祸前曾申请来中国访问而未获批准。

丹娜的死讯，是从丹娜的姐姐的远方来信中传来的，这封信的最后两节是这样写的——

我愿通知你们，丹娜的骨灰已安放在家人的墓中，地址是：奥尔桑一号公墓九区三十八号。你们当中认识她的人偶尔路经那里，请到她的墓前停留一下，向她表示怀念。或点支小蜡烛以志哀思。丹娜在九泉之下，将会感到欣慰。

我不知道，你们可否把丹娜去世的消息告诉诗人艾青。如果可以，那么请你们向他转告：丹娜一生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是一位她最喜爱的诗人。

艾青在诗的结尾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

多么可贵而又多么艰辛——

像火灾后留下的照片，

像地震后拣起的瓷碗，

像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

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扁……

安息吧，

亲爱的丹娜。

在这样的诗行里，我们能听到“魂兮归来”的呼唤，能看见一根血红色的、遥祭的腊烛——那仿佛也是艾青的流泪的心。

他的作品被译成俄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罗马尼亚文、捷克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亚文、芬兰文……

全世界有多少爱好诗歌的人，都知道艾青，都在读艾青的诗；艾青——我们中国的艾青。

文青说：——“这些荣誉，是给我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的！”

1982年初夏，在杭州西子湖畔他下榻的大华饭店里，他对满座的朋友说：“农民种地，在他们的稻子上留下名字了吗？我算什么呢？一个普通的诗人，不过是写了几首还有人愿意看的诗罢了。”

有人对艾青说，杭州有很多人想来看你。

艾青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从公园里跑出一只猴子来，也会有很多人围观的。

艾青在西湖边上散步的时候，正好是玉兰花开放的时候。

艾青想到了在西湖艺术院的时光。

他是从这里出发，开始流浪生涯的。

他走了半个多世纪，连湖山也变了。

他说，西湖过去多的是弱柳，现在有了很多的阔叶木。

他指指玉兰花，随口说出了一句诗：“就像是我手里抛出的一块白手绢。

归来以后，在新的生命的航程中，艾青一如既往：凌晨两三点起来，用手蘸一点凉水擦擦眼睛，趁着晨曦与箱珠将要出现，都市或乡村万籁俱寂的时候，奔放形象思维……

艾青写出了多少属于这个时代、属于广大群众的好诗！

《在浪尖上》的最广泛、最迅速的传播者，是读者，尤其是千千万万的青年读者。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待句：

正义被绑着示众，

真理被蒙上眼睛……

总理是大家的，

空气是大家的，

太阳是大家的，

大地是大家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得到过这么多诗篇；

历史上没有一个人

得到过这么多花圈！

继《在浪尖上》之后写的《光的赞歌》，则融注了诗人更多、更深、更为久远的思考，以更加凝练的光的艺术形象，歌颂了科学、文明，歌颂了人民、未来。

《光的赞歌》就象是巨大的冲击波一样，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传诵着。

她是诗人举起的又一个火把——这一个火把，只是更具有现代科学与文明所赋予的更亮、更美、更为持久的光彩。

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样的诗行：

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天文学数字中的一粒微尘

即使生命像露水一样短暂

即使是恒河岸边的细沙

也能反映出比本身更大的光

我也曾经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在不自由的岁月里我歌唱自由

我是被压迫的民族我歌唱解放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经为被凌辱的人们歌唱

我曾经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

我歌唱战争，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
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
我是大火中的一点火星
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
我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
把“一”和“无数”溶合在一起
进行为真理而斗争
和在斗争中前进的人民一同前进……

就在这首《光的赞歌》里，诗人对他所挚爱着的古老的、多灾多难的民族，倾吐出来的是多么年轻、多么动人的祝愿：让我们以最高的速度飞翔吧
让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飞翔吧
让我们从今天出发飞向明天
让我们把每个日子都当做新的起点
或许有一天，总有一天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我们最勇敢的阶级
将接受光的邀请
去叩开那些紧闭的大门
访问我们所有的芳邻
让我们从地球出发
飞向太阳……

太阳，人民，光明，火把——这些象征着人类发展与追求的形象，也是艾青毕生为之讴歌的一切。

就在这必然的、小小的往复中，读者蓦然感到：艾青的诗的创作，在他的诗心不老的晚年，又登上了一座——第三个风景壮丽的高峰。

如果说他的五十年的创作历程，就像是一片茫茫的、起伏的、布满了荆棘同时也留下了攀登者种的波斯菊的山岭的话，那么，他的第一个高峰，应是在抗战初期的离乱岁月中。

与这两座高峰相呼应，互为引证的是他的第二个高峰——《诗论》——那是一座格外陡峭、从险峻中生出美感的高峰。

高山都是起于平地的。

高山都是由无数的、不规则的石块垒积而成的。不能说他的诗都是珠玑宝玉——就连他自己也不喜欢珠光宝气的。

他的关于诗的格言是：

单纯。

朴素。

集中。

明朗。

他明确而又坚定地指出：“看不懂的诗，我是不放恭维的。”朋友送他一根很漂亮的拐杖，他让它靠边站着，他不喜欢它。

他喜爱各种树根，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他说：那是坚实的，那是美的。

那么，就把他的一些小小的抒情诗比作是石头吧——裸露着，风吹着，

雨打着，虽然有时也剥落着，但，总不失自己的形态，并且以自己的骨胳，支撑着大山的美。

他的《回声》：

你不理他

她不理你

你喊她，她喊你

你骂她，她骂你

千万不要和她吵嘴

最后一声总是她的

他的《海水和泪》：

海水是咸的

泪也是咸的

是海水变成泪？

是泪流成海水？

亿万年的泪

汇聚成海水

终有一天

海水和泪都是甜的他的《仙人掌》：

.....养在窗台上

梦想着海洋

他的《希望》：

像窗外的飞鸟

像天上的流云

像河边的蝴蝶

既狡猾而美丽.....

他的《时间》：

时间长着一副利爪

它会抓破娇嫩的脸.....

有的时间不能估价

有的时间一缕青烟

活着就要和时间赛跑

一切速度都在争取时间

她的《花样滑冰》：

冬季的花朵

寒冷的狂欢.....

用飘动着的点

画出飘动的线

有大的弧线的徐缓

有小的急促的旋转.....

力学的梦幻

几何学的迷恋

没有休止符的音乐

没有标点号的诗篇.....

他的《镜子》：
仅只是一个平面
却又是深不可测
它最爱真实
决不隐瞒缺点……

他的《山核桃》：
一个个像是铜铸的
上面刻满了甲骨文
也像是黄杨木雕刻
玲珑剔透、变化无穷
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
还是雨雷电的檄文

这些捡不胜捡的小小的“石子”，却一样灌注着艾青在沉默多少年之后的情操，感怀；一样毫不逊色地与他的宏篇巨制一起，闪发着这个年轻的老诗人的心灵的火光、才华的魅力；也是高峰上的一个个细小、具体而又扎实的部分。

艾青并没有把自己孤立的高峰上。

他总是告诫别人：“每一个诗人都有一条道路，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世界，不要贬低别人来抬高我。”

他说：“棒得愈高，摔得愈重。”

他喜欢真诚的谈吐。

他喜欢真诚的诗。

真诚。

坦率。

幽默。

是艾青的魅力的一部分。

是迷人的艾青的三根祖线条。

真诚，可以见心灵。

坦率，可以见肝胆。

幽默，可以见真情。

他从来不想掩饰自己，他说：“我是有缺点，有错误的。”

他坚决地宣称：“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世界大同！”

他不吃糖，也不吃水果，他说，“我习惯了。”

他的生活照例是俭朴的，喜欢吃炖得烂一些的肉，喝一小杯治眼睛的“蛤蚧酒”。

他喜欢抽烟。

他抽了半个多世纪的烟，心灵却没有被污染。

他对朋友的友好的表示，是紧紧地握住你的手。在那样的时候，你会感到他的力量，他仿佛握住了你的心。他特别喜欢在延安时，和运盐队的民工一起照的照片。他还唱过从民工那里学来的歌。

他的嗓音并不动听，但，他是认真地唱的，他自己失被陶醉了的。

一支是：

你妈妈打你，你跟哥哥说，
为什么要自己吃洋酒，

你妈妈骂你不成材，
露水地里穿红鞋……

另一支是：

骑白马，
挎洋枪，
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嗨呀，
打日本，
顾不上！

他一直忘记不了，在新疆的一个地窝子里，那些悄悄地掀开门帘给他送过粮票、大米的不知道姓名的青年人。

他常常说起在金华老家一个土地庙里，见到过的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笑脸笑遍人间可笑之人。

去年，艾青有一次回到了金华故乡。

回到了大堰河的身旁。

男女老少都把他当作乡亲。

艾青把一粒糖剥掉纸，送到他的亲人、大堰河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手上。

每次回乡，他从来不去看父母亲的坟。

但，他一定要去看看大堰河安息的地墓——没有墓碑，只有小草与黄土的墓地——那里葬着一个“紫色的灵魂”，一个用奶汁养育了艾青的真正的母亲。

大堰河，你笑吧！

你是真应该笑的。

艾青还想起了一件往事：《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居然也传到了他父母亲的耳朵里，母亲对艾青说：“你写了乳妈，却没有写生下你的妈。”

艾青什么也没有说。

艾青告别了金华故乡。

火车开动时，一个大学生一边追，一边喊：“给我一个火把，给我一个火把……”

艾青笑着，指指天空：“现在是白天，还要什么火把！”

艾青归来之后，曾经带领四十余人的诗人访问团，寻访南方海港，从广州至海口，一直走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

大家都去拾贝壳时，他却一直在海边走呀，走呀——卷着裤腿，一只手里拎着两只鞋。

后来，他说：“海浪打了我一巴掌。”

同行的诗人回答他说：“那是因为大海爱你！”

大家都在写天涯海角的诗。

他说：“追你到天涯海角，这是爱情的誓言；流放你到天涯海角，这是苦役的极限。可是，地球是圆的，生活和事业永远是天外有天……”

那时，笔者望着艾青的身影，曾感叹过：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他又是追求美的；他是虔诚地信仰革命的，他又是拒绝一切标签的。

在天涯海角，在呼啸着、奔突着潮水的海边，他的思路是断然不会平静的。他一定想起了1954年7月25日在智利海边逗留的情景，他看见了礁石，他写了一首题为《礁石》的诗，而现在，他自己站在大海之滨的时候，却使人蓦然想起：艾青和他笔下的礁石何其相像：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放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他在海边并不是作一次悠然的散步。自然，当长期的流放生涯结束，心灵上的重压一旦消除，尽管在回味中的苦辣会更深地灌注到心灵中，但，现实毕竟已不同了。从此后，他会有一本久违的北京的户口簿，会有另一本可以买到豆制品及粉丝，麻酱的副食供应证。高瑛就可以向四邻八舍的、关怀过艾青的父老们说：“谢谢了，谢谢了，我们自己也有副食本了……”

哦，真的，他是在这南海之滨，在这古代的流放之地，在传说和诗歌中的一处既被人歌颂、也叫人害怕的天涯海角，作一次人生的、如海水一样苦涩的回味，拾取着如贝壳和云母片一样的过去的岁月；或者竟如他后来所写的追记聂鲁达的文章里所说的，思绪久久地穿行于往事、沉船、和友谊之间……

他依然是朴素的。

他依然是带点忧郁的。

他早在1939年7月于桂林写的《北方》序中，就说过：“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显得毫无遮蔽，而我又对自己这种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很久了，我就在这样的境况里继续着写诗。”

在这一段话里，艾青对于朴素的注解是别有一格的，即“情感的毫无遮蔽。”而在同一篇短文里，艾青又指出：“近来常常有一种企图抹煞刻画现实面貌的任何诗作的恶劣倾向。”毫无疑问，艾青的情感的源泉是生活，是“中国新文学之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

因此，才有艾青的名言：“我生活，故我歌唱。”

他的忧郁，在很多评论家的笔下是曾经被指责过的，当成了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伤感情调。至今还有这样的论者写道：

“我们不否认艾青存在一些时代的浪子的不健康情调……”

笔者本不想涉及这一些话题的，也无意和别人争论。只是纵观艾青半个世纪的生涯和创作，以为：忧郁之于艾青，是流浪者的心灵发出的真实声音，也是时代和生活所赋予的，又在艾青这一个具体的在流浪中寻找光明、在流浪中成了诗人的人身上，得到了天然的结合和反映。

我们果然可以变忧郁为不忧郁，但，这一种变化是革命者肩负重大使命的奋斗，是长期的改变生活和时代的努力，而不是像变戏法一样，让本来忧郁的心灵，本来忧郁的时代，蒙上一层玫瑰色的面纱。

更何况，艾青的忧郁在漫长的追求着人类解放的岁月中，是不断地有所变化的，是渐渐地显得轻淡了的。这一种淡淡的忧郁，对于读诗的、好激动

的人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清醒剂，是可以使人想起生活之大、之深、之杂的启示；由此还能在呼应的心灵上点出亮光——那是可以烛照未来的。

读者也许会记得艾青写在1941年冬天的一首诗《时代》，其中有这样一些诗句：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恨，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是一首曾被姚文元竭力攻击、污蔑，并企图永久地打入冷宫的一首诗。
可惜，棍子毕竟不是真理的对手！

在这首诗里，诗人面对变化着的时代的发自内心的剖白，也是献给这个时代的一支颂歌。但，艾青之所以为艾青，在这首诗里也一样表露得淋漓尽致——他是以自己的观察来写这个时代的，他是以独特的感受来歌唱这个时代的；而这一切又因为他的诗人的敏锐感觉或预感，还使他想到了“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更不可解的怨恨，和更致命的打击”——这又可以说是一种淡淡的忧郁了——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毫不妨碍诗人跟随着时代而前进的脚步——“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我的生命……”

难道这还不够真诚吗？

难道这还不够感人吗？

难道这还不是诗人心灵的高亢激越的呐喊吗？

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诗人是时代的歌者，是人民的儿子吗？

是的，也许有人会说，倘若这首诗中没有了那忧郁的几句不就更加尽善尽美了吗？笔者不想回答这个天真得近于无知的问题，而只是想顺便指出：恰恰就是这忧郁的几句，不幸均被诗人言中，夫复何言？

但，艾青是有言在先的，为着这个时代，为着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的到来，他是可以牺牲自己、牺牲一切的——“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就是艾青啊！

这就是人民中间的艾青！

这就是不管在多么曲折的路途上，多么厚重的压力下，也期冀着曙色和光明的艾青！

随着一连串的归来的歌，艾青，回来了。荣誉和地位也回来了，真诚的赞扬和不真诚的赞扬也一起涌来了，而“更大诽谤”和“更不可解的怨恨”也并没有从此绝迹；生活，真是迷云重重的。而在这个时候，他又来到了天涯海角。

艾青，有没有新的忧郁？

走到了天涯海角的艾青啊！

他还在寻觅着——

已经过去的岁月。

正在喷发的灵感。

一切，一切都在重新开始……

有海鸥来寻他。

有风帆在唤他。

他用目光在和海鸥、风帆交谈。

新鲜的、带着咸味的海风里传来的声音一如往常，舒缓而沉重——“诗人的劳役是：为新的现实创造新的形象，为新的主题创造新的形式，为新的形式与新的形象创造新的语言。”

在离开天涯海角后，在大轿车穿过一片又一片橡胶林时，车轮在呼唤着，它们找到了自己的母亲；而笔者想起的却是艾青自己曾经引述过的那两句话：

“安明！

你记着那车子！”

尾声

艾青，已经七十三岁了

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古稀之年，白云也渐渐地开始笼罩他的头顶。他确实是个老人了，但，毫无疑问，他仍然是个真正的诗人。

沉默、凝重、平和取代了他青年时代的潇洒、英俊及锋芒毕露。他时常对朋友说：“我既无大喜，也无大悲。”他的内心与外表往往是淡泊的，就像一块土地，在经历了年复一年的春天的播种、夏天的耕耘、秋天的收获之后，反而显得平静、单调、也更加自如了。

谁不怀念繁花似锦的春光呢？

谁不留恋浓荫如帐的夏日呢？

在那样的春光里、夏日中，所多的是生活的艰难、跋涉的渺茫，是在异国他乡和在自己国土上的流浪，自然，也有火把的吸引、爱情的魔力以及黎明在远方的呼唤……

耕种着生活、耕种着理想的信念的纽带，即使是在他当右派、被流放的岁月里，也一直没有断裂过。

他可以失去生活中的一切，但，他不能不写诗，不能没有诗。

他的诗，是他心灵这块土壤中的、倔强地生长着的小草、野花、庄稼。

他播种着，也收获着。

他的诗和他自己，愈来愈像是他曾经含泪讴歌的那一片土地了。

诚实的。

素朴的。

坦荡的。

坚韧的。

包含着风雨日月的精灵。

蕴藏了返璞归真的美。

说他沉默，并不是说他不再说话。

他总是说得不多。他的眼睛因为多年害病，视力锐减，他总希望能仔细地看看这个世界，看看人生，看看千变万化的生活，

看得稍稍清楚一点以后再说。

他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诚的——虽然，未必都是动听的。

有时，他反应敏捷；有时，他大智若愚。

有时幽默。

有时尖利。

有时缄口。

他自甘寂寞，他不怕寂寞。他十分明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真正的沉默乃是没有诗。

没有灵感，没有思索，没有美的探求，没有想象的翅膀，没有风骨的支撑——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沉默——无异于死亡的沉默。

艾青还在写诗。

虽然，他的那一双捕捉了半个世纪的诗的形象的眼睛，并没有因为他的诗的光彩而永远炯炯有神；但，他要把剩下的那一点视力全部用到诗的创造中去——从古罗马的斗技埸，到生活之海的浪尖上，在渴望着光明的孩子的瞳仁里，在期冀着发现的海边的鱼化石身上，甚至在捷克的女汉学家、艾青的亡友丹娜的灵魂上，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都会惊喜地看见：“呀！这就是艾青的眼力。”

他是个老人了。

他和所有的老人一样，或多或少地也有一点自己的打算。

他没有多少钱财可以留给自己的孩子。他在一次谈到有一家兄弟俩因为父亲的遗产而拔刀相见的情景时，感慨道：“钱多不是好事！”

他的好朋友江丰去世了。

有好几天，他茶饭不思、三叉神经痛也开始很厉害地发作了。忍着病痛，他为江丰写了一首诗。一百行的诗，先后五易其稿。

他是这样评价江丰的：“一个朋友，交往了五十年，没有吵过架，没有翻脸，劝他休息，他不听。如此，这般，实在难得。”在江丰的遗体旁，他没有流泪，他不能让泪水挡住了视线，他要多看一眼……

他偶尔也谈到死。

无论什么人，无论用着多么超凡脱俗的语言去说到死，其实质无疑都是包括着对生的眷恋的。

生活着，总是美好的。

差别只是在于：眷恋什么？为什么而眷恋？

他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他有很多诗还没有写。

他还是眼以往的老习惯一样，把一首诗改了又改。每改一次——哪怕只

是几个字的更动——也要另纸重抄。

为了逐字逐句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他不得不借助于放大镜。一个明晃晃的放大镜就摆在他书桌的右角上。

不知道生活在放大镜的照射下，将会显示出何等清晰的面目？

在平时，在旁观者看来，这一面放大镜却会使人想起艾青，想起艾青的诗，想起一句古老的成语：炉火纯青。

1983年8月苦夏初稿于北京

1983年腊月改于北京

1984年新春再改于北京

1984年7月定稿于热风中

北京东郊金台村一苇斋后 记

当这一本书稿终于要支出去，并且有可能出版，因而将会受到时代与人民的检验的时候，我首先想要说明的是：直到此刻，我的心情，依然是惶恐的——因为，凭我的经历、学识和才情，是难以写好艾青的，我既不敢白认为是他的朋友，也不敢自命为他的学生；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由读诗而想要知人，便有了一些接触，有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这些文字应该是这一本书的最早的雏形。

我亲见过拿着笔记本，扮着面孔去采访他的人所受到的冷遇——艾青不喜欢这种正而八经的盘根究底。而同时，他在随便聊天时，却总是谈笑风生的：那么惊人的记忆力，那么风趣的语言，那么尖刻的挖苦，有时甚至会学一两种很可以乱真的方言，或者是哼几句在久远的年代里唱过的歌。我一边听，一边记住了这一切，回家后赶紧找一个小纸片，把快要溜走的记忆写下来，渐渐地，这些小纸片竟有了厚厚的一叠。

他的迷人，使我有了一再的冲动：且来一次不自量力之举，写写艾青。

我写艾青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其时，我是大会的记者，与他的接触渐渐地多了起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核桃·珠贝·鱼化石》，后来发表在《长江》文学丛刊上。

我是用竖格的稿纸写的，给艾青看的是初稿，字迹也潦草，他很吃力地读完了，评语是“后半部分还不错”，他也有惊讶：

“这些材料，你怎么都记住了呢？”

读者的反映要更强烈一些，那是因为我写了艾青，写了一个真实的艾青的侧影。

以后，我又写过《艾青素描》、《艾青访问记》、《少年艾青》，这些文章发表后，艾青都看了，并亲自校正了若干差错，依旧是原来的惊讶：“这些材料，你怎么都记住了呢？”其实，我也很有些时候，因为听得忘乎所以便反而记不住了的，那就悄悄地找机会再问他，千万不要提一连串的问题，如是，他会不耐烦地问：“又想采访了？”

艾青与高瑛住在北纬饭店的时候，与我的住处只有一箭之遥，走七、八分钟便可以到的，便经常在一起聊天。最晚的一次是到凌晨两点。我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柜台上的服务员正在打瞌睡。

我是满载而归的。

我得到了很多书本上、资料上所找不见的艾青的足迹，艾青的影子……

我曾有过洋洋几十万言的提纲，后来，在痛苦中被自己否定了。

我知道，至少我的笔（或许也还包括别人的笔），是无法把艾青写全的，而写完也未必就动人——全到什么地步呢？真是说不清楚的。而传记文学的写法，实在也应该有一些新的尝试。

我只是试图寻找他的多灾多难、也丰富多采的生活中的最精彩的那些年月和场景。

我希望着能用自己的笔画出他的眼睛来。

我还尽量少去叙述，而是用散文的语言去抒写；我还希望能和他的心灵靠得近一些——尽管，这样做是很难、很难的。

我努力做到真实，但，也实在做不到有闻必录。

我无法预测他的未来岁月及身后，然而，我以为可以断定的是：他的一些诗，将会被历史证实是不朽的；他的《诗论》，将会对今后的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最终人们将会认识到：这是自有中国新诗以来的最深沉、最广博、最美好的一部论诗的美文。

自然，一定会存超过艾青的；但，那不是现在，也不是可以预见的将来，更不是自以为超过就算超过、急着超过就能超过的。

正式动手写这部传记是去年夏天，中间几易其稿，不觉又是一个苦夏了。尽管我为这部传记付出了大量的汗水与时间——在这一年中间只写过很少几首诗以外，几乎没有写过别的——但，我知道它仍然是粗浅的、不足以表达艾青的。我也无法写一本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满意的书，这是要请亲爱的读者原谅的。

这本艾青传记的初稿《艾青雕像》曾在创刊号的《传记文学》上揭载，谢谢热情地支持、关心我的《传记文学》的编辑。

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倘不是他们催促着、鼓励着我，这本书也许不会现在和读者见面的。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重温艾青的一句话——历史在用宁静的眼睛注视着你。

作者

1984年8月于北京东郊金台村一苇斋热风中

